

炎黄春秋

第 **10** 期
2010 年

**谢韬：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恐怖的“红八月”**

省长王昭之死

**田纪云：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目 录

本刊特稿

- 1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谢 韬 遗作

人物志

- 8 省长王昭之死尹曙生
15 广西农王韦拔群莫荣强

亲历记

- 21 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田纪云
23 我经手处理的两封李昌来信陈德邻

怀人篇

- 24 深切怀念李昌同志本刊编辑部
25 青年团的建立、改造与重建冯兰瑞
31 怀念张邦英陈日昇
35 痛悼徐孔黎 白

一家言

- 38 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杜导正
40 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穆广仁

争鸣录

- 43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李维民
48 “周惠谈话”辨伪韩 钢

求实篇

- 55 恐怖的“红八月”王友琴
62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赵宗礼
67 农业科学中的权力灾难辛 北
71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张持坚

品书斋

- 75 读周有光《朝闻道集》笔记于 友

故纸堆

- 78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王晶珏

忏悔录

- 79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王炼利

海外事

- 83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李玉贞

顾问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副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谢 韬 遗作

谢韬同志于2010年8月25日逝世,享年89岁,本刊发表他的一篇遗作以表纪念。

——本刊编者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的去世,正好六十年。这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六十年。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



谢 韬 (1922—2010)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他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代,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之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

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诚)做职员,逐步升任经理。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自流井(今自贡市)。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19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

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夸奖她这个兄弟。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还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

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李慎之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同年月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什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

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我也是这些行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 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李中和我都被列入了黑名单。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傅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这些引起了专制当局特务的注意。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还暴

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人士。在访问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门,在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跟随去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由他直接领导。

1946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

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中央工委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新华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长一短两支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过五六平方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程超过150里。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竟以料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同年8月我从新华社调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担负“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我被评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社总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1955年和1957年两人先后遭难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么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

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璋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人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我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过了半年光景,“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垚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

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做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们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

1976年“红太阳”终于落山。“四人帮”就擒。“文革”不宜而止。

那时候李慎之被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皇亭子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是这场全民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风雨苍黄五十年》流传海内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慎之在12年间发表了将近50篇文章,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

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点。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两千两百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多年中,各时期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替代的法

宝。

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起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有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己的威权,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前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反思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英国

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具有共同的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处于世纪之交,李慎之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21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还未完成。“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已经触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19世纪末以来80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成立十周年,回报作者大赠书活动

值此我机构成立十周年之际,为了对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关注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现推出“回报作者大赠书”活动。每名作者均可获赠三册市场上任何出版社出版的任何您喜爱的图书!并免收邮寄费!详细情况请登录网站:<http://www.bookhk.com/>,或拨打热线电话:400-680-8368(长途免费),或发邮件至:bookvcd@126.com

出版社继续约稿

国内正规出版、公开发行,或海外正规出版、公开发行

- **书稿内容** 1. **文史类**: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作品等; 2. **社科类**:社会科学、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 **文学类**: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作品; 4. **小说类**: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败等长篇、中短篇小说; 5. **艺术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绘画作品;毛笔、硬笔、篆刻等书法作品。
- **书稿要求** 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 **出版发行办法** 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分别面向国内以及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24小时全国投稿热线:400-680-8368(免费长途电话)

我们每年运作500余部图书,新书欣赏、网上订购,请登录:<http://shop.chinesezj.com/> (学习新知书店)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100025)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综合编辑部(收)

电话:(86)10-81118378、81118398、86878777、58429718 传真:(86)10-8950687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伽悦、文馨、高晶、汪鹭(编辑)

详情请浏览网站:<http://www.zuojiaaba.com>(中华出版热线),或<http://www.bookhk.com>

省长王昭之死

● 尹曙生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在牧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人,还有50多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

种”,使王昭非常震惊。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问题发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被开除党籍、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借助造反派批斗王昭,文革后,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左纠左也是存在的,对少数人的处理造成了新的冤案。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

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 and 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人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人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情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他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

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却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7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



王 昭 (1917—1970)

后面貌啊！

“四清运动”中王昭的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树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 90% 的干部被批斗，37 人被斗后自杀，19 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

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 349 名基层干部自杀。到 1966 年，青海 13 个县“四清”运动中，有 1700 多名干部自杀，99% 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 40 多人自杀。

按“四清”运动设想，要把农村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村干部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赔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贪污了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大跃进”时多吃多占的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他们家的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

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一个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1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错的。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 and 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

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有人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峰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毛泽东从未到过青海),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可见心情之沉重。给他准备的雪鸡倒是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表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

工作人员买了一点。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还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邓小平阅读,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

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赵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难免为这一惨案承担责任。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

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现在周恩来这样说,让他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写信,共有12封

之多。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些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

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

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饮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广西农王韦拔群

● 莫荣强

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曾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其实,当时中国“农王”有三个:即湖南的毛泽东,广东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金冲及先生在他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1922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韦拔群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时间还早于彭湃。韦是在1921年秋。

在1925年以前,广西还没有中共组织的活动,韦拔群一直在自发地搞农运。在他的领导下,广西右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土地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为后来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的种种原因,右江农运和韦拔群的事迹未得到广泛传播,甚至有误解误判的情况。笔者认为,谈中国早期的农民运动,不谈或忽略右江农民运动是历史的残缺;谈广西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谈或忽略韦拔群英雄事迹,不是真实的历史。

一、“愤不平”的拔哥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生于东兰县中和乡勉俄村东里屯。他少年丧父。祖父韦天宝,原先靠打草鞋和砍柴卖为生;后经营烟酒生意,逐渐富裕。韦拔群从小与村中贫苦儿童一起玩耍,经常暗地接济贫苦同伴。他逐渐对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产生了不满情绪,他愤恨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一次,他带着一帮穷孩子用木工钻,把武篆

街上一个大财主的米柜底钻了一个洞,让米沙沙地流出,每个孩子都得了一袋米,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韦拔群“偷米济贫”,人们暗暗称奇,说他小小年纪就做仗义大事,长大了一定是个人物。小伙伴们更是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14岁时,韦拔群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后入宜山庆远中学续读,1911年底,转到桂林政法学堂。因反对强令给校长送礼,毅然退学。1916年,他愤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在家乡邀集了百余青年,卖掉部分田产、耕牛,自购枪支,长途跋涉,到贵州投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任连副,为保卫共和而战。后因不满连长虐待士兵,以“愤不平”笔名散发传单,曾一度入狱。后经友人保释,韦拔群到贵州讲武堂深造。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不久离队。1920年底,在广州加入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次年,马君武任广西省主席,但军政大权操纵在军阀陈炯明手中,韦拔群不愿为军阀效力,先后两次谢绝了马君武委派他到南丹、东兰任县知事(即县长)之职,于1921年中秋节回到东兰。从此开始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二、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三打东兰

韦拔群回到东兰,找到旧时同学和具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书祥、黄树林、廖源芳等共18人,于1921年9月底结成革命同盟,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开始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活动。

当时,陆荣廷残部在广西纷纷打起“自治军”旗号。刘日福在百色一带自称“司令”,与在都安、马山的“司令”蒙仁潜部下邓祖贻都到东兰滥收苛捐杂税。

1922年1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



百色起义纪念碑

会”，决定团结一致，抵制苛捐，并由韦拔群、陈伯民为代表到百色去见刘日福，要求他收回征税成命。刘日福迫于韦拔群与马君武的关系，不得不写了张免征布告，交韦拔群、陈伯民带走。二人连夜赶回武篆，向群众宣传出示刘日福的免征布告，群众闻讯，莫不欢欣鼓舞。通过这次斗争，韦拔群得到群众的尊敬和景仰。

1922年3月30日，同盟会11人在北帝岩（1930年根据张云逸建议改为“列宁岩”）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韦拔群起草，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发表、散发的《敬告同胞》文告，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组建农民自卫军。

为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活动，大家同意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公民会”。从此，东兰农运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斗争。

同年10月28日，韦拔群等召集东兰、凤山、都安、百色四县公民会骨干180多人，在他家对面的银海洲歃血盟誓，扩大成立革命同盟。

会后，公民会分工到各区乡发动组织群众。韦拔群首先到西山弄凡召开了千余瑶民大会，宣讲革命道理，号召瑶胞加入公民会，立刻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纷纷拿出自己的火枪、大刀、长矛，组建了西山自卫军。随后，东兰各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也顺利建立起来。

群众发动起来后，强烈要求清算罪大恶极的大土豪、东兰县团总韦龙甫。仅都邑、长江两区农民向“公民会”揭发、控告韦龙甫的案件就有五百余起，群众莫不切齿痛恨。6月26日，韦拔群率公民会百余人赴县衙清算韦龙甫的罪行。由于组

织不周，清算未能成功，“公民会”反而有6人被捕。

韦拔群及时召开公民会和自卫军骨干会议，发动群众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揭开了民主主义时期广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其中二次失利，第三次攻城获得成功。农军占领县城后，成立东兰革命委员会。韦拔群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韦龙甫等劣绅的财产、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自卫军在县城纪律严明，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社会秩序井然。广大群众欢天喜地，人心大快。

当时，刘日福不敢贸然镇压，便采取软化的办法，派其司仪黄瑶琼接任东兰县知事。黄上任后，即以“和事佬”的姿态，调解所谓“新党”、“老党”之间的纠纷，并提议成立参事会和议事会，以吸收公民会成员参加。由于公民会斗争经验不足，接受了黄瑶琼的提议，自卫军从县城解散回乡。

三、广州农讲所的优秀学员

1924年2月，黄瑶琼及东兰劣绅等，向广西省长诬告韦拔群等农民领袖为“劳民党”作乱，下令通缉。韦拔群等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感到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遂决定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1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辗转来到广州，进入中共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第三期学员，主任是阮啸仙。在那里，韦拔群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他还认真学习湖南、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赴海陆丰考察学习“广东农王”彭湃开展农运的方法和经验。通过三个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救（东）兰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此，他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

3月中旬，韦拔群、陈伯民受当时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的委任，作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带着《农会组织法》等文件，回广西筹划开展农民运动。

5月初，他们沿途邀集散藏在外的黄大权、

牙苏民等农运骨干,由南宁步行回武篆。稍后,即组织了一支有几十人参加的学生军,到东兰各区进行革命宣传,筹组农民协会。至8、9月间,便建立了70多个农会,拥有会员2万多人。8月13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成立。选举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黄大权、陈守和、黄书祥等7人为委员。

到1926年,全县有11个区、13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7.8万人。从此,东兰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至1927年3月,全县农会会员高达8.7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72.5%(参见《中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中共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第85页)。

东兰县农民运动发展如此之快,这与韦拔群优秀的宣传、鼓动工作密不可分。他善于运用山歌形式,亲自编词配曲和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演讲。历史学家吴晗在1955年主编的《韦拔群》一书中,称韦拔群为“天才的宣传家”,“广西各族人民共同爱戴的领袖”。

韦拔群深知欲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必须培养出一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队伍。于是,他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法,在东兰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养了三届596名农运骨干。其中,有不少学员,如黄治峰、覃道平、唐向岩、黄文通、黄伯尧等都是各县农运领导人。

韦拔群还选送优秀学员外出深造。如东兰县青年陈洪涛1925年12月被选送到国民党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第二年春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中共广西特委常委、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主席,成为与韦拔群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战友。

四、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

农讲所的兴办,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构成了严重威胁。12月21日,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率领县警、民团数十人围攻农讲所。第二天,韦拔群率学员和农军反攻。黄守先败退县城,即以“土匪谋叛”罪名,向百色、南宁诬告“请兵痛剿”。1926年1月,刘日福派团长龚寿仪带兵到武篆镇压。

2月5日,龚寿仪团伙同土豪民团共数千

人,把东里屯及武篆区十一个村屯全部烧光抢光,一些农民被活活烧死。韦拔群的家被烧,祖坟被掘地三尺。西山十个峒场和江平乡一带的村屯也被烧掠一空。武篆镇压相当血腥。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1926年1、2月间,东兰县全县被杀害者多达500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两广的“东兰惨案”。

面对军阀的血腥镇压,韦拔群率农军退入西山,以西山为根据地,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坚持武装自卫。同时,将农军分散成“锄奸团”,开展游击战争。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军看到韦拔群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也自动组织“锄奸团”,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数日益增多。4、5月间,韦拔群在锄奸团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恢复了农民自卫军。在总指挥下分为三路,分由覃孔贤、黄大权、陈锡元指挥。农军与龚寿仪军多次作战,重创龚军,双方开始处于相持阶段。

1926年6月,龚寿仪团奉命调回百色。韦拔群领导农军由积极防御转为主动出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农军总部从西山迁回武篆,革命声威大震。

9月10日,韦拔群率领农军攻打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弃城逃跑。农军入驻县城后,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查办黄祖瑜,并派陈伯民、黄大业等人到南宁向各界说明“东兰惨案”真相,得到南宁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及北江地区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广州国民政府也责成广西省政府对“东兰惨案”要追查。

10月初,在各界压力下,广西省政府成立“东兰农案”调查组,由省党部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任“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东兰县知事。调查组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经过反复斗争,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6年11月28日向广州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和两广省党部发出了处理东兰农案的《俭电》:承认农运、农军、农讲所合法,拨给农军子弹;撤职、惩办贪官,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交县农会“分别赈恤”;准许东兰农民豁免1926年全县一年的粮赋等等。

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历经近一年,最终以

东兰农民的胜利而结束。

中共中央局 1926 年 12 月 5 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誉:“今年二月,广西东兰发生了县长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为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五、“跟共产党铲除天下不平”

韦拔群早在广州农讲所,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阮啸仙、彭湃。由于学习时间短促,又奉命回广西,所以未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4 月,中共广西省筹备组在南宁成立。广东省委即派余少杰、严敏到广西发展党员,建立右江党组织。10 月,陈洪涛、严敏、陈鼓涛到东兰协助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加上在东兰代理县知事、中共党员陈勉恕,四人于同年 11 月建立中共东兰支部,陈洪涛任书记。经陈勉恕、严敏介绍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特委某些领导人认为右江农运是“豪侠式运动”,韦拔群是“英雄式领导,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所以,迟迟未批准韦拔群为中共正式党员,直至 1929 年 8 月才得到转正。

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言简意赅:“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全文加标点符号共 44 个字,没有套话空话,字字真切。

六、红七军的奠基人

1929 年 6 月,蒋介石委任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绥靖司令。俞、李是国民党中较开明的左派人士。俞、李主政后,为巩固政权,要求与中共合作。7、8 月间,张云逸、邓小平等中共干部陆续抵达南宁。此时,韦拔群到南宁参加俞作柏支持召开的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俞作柏听说右江农军武器短缺,当场拍板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赠送韦拔群 300 多支步枪,子弹 2 万多发,装备东兰、凤山一个营的武装力量。韦拔群即从东兰调

来 300 多农军领取枪支,并就地接受训练。这些战士后来回到东兰成了农军的骨干力量。

随后,中共广西党组织决定推荐一批干部给俞作柏委任右江各县县长,韦拔群把最能干的战友陈洪涛、陈伯民、黄大权、黄书祥推荐给了党组织。

但是,邓小平认为:“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载《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第 68 页。)

同年 12 月 11 日,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龚楚等领导百色起义(11 月中旬邓小平已去上海,1930 年 2 月回到龙州),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起义大会由龚楚主持,陈豪人宣布红七军编制:党代表(即政委)邓斌(即邓小平。11 月初,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龚欣冰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央指示: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楚、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农军 2000 多人是起义军的主要成分。这 2000 多人加入红军,一部分补充到第一、二纵队;另一部分编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长。这时,红七军全军 4000 余人,“从旧军队过来的只有 1000 多人,其余都是右江地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从人员组成看,红七军大多数战士或来自韦拔群领导的农军,或来自他的农讲所学员及其麾下。1930 年 2 月隆安、平马、亭泗战役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抽调各县农军近千名,补充红七军第一、二纵队;第一、二纵队随后出发到桂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守根据地。张云逸说:“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

韦拔群这时不仅指挥作战、训练部队,还积极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他率先建立和巩固东兰、凤山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并早在“1928 年 7 月黄松坚由韦拔群派赴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朱毛红军部队学习土地革命”,韦拔群等积极带头加入共耕社。在短短的半年中,红色的右江各县,各项建设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1930年2月,邓小平从上海绕道越南回到龙州,于4、5月间,到右江寻找红七军主力传达中央指示,除去往返河池二次,在武篆住了约半月。等待期间,曾参与指导了当地第二阶段的土地革命工作。

同年9月,“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邓小平说:“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10月,部队集结河池县进行思想动员。此前,由于红七军主力收复百色、果化伏击等战斗减员,又再次抽调各县农民赤卫军1000余人,整编为三个师(以黄治峰领导的奉议赤卫军为主),邓小平“因恐东兰士兵逃……我及拔奇同志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第三纵队出(去)河池。”就在全军从河池出发前,军领导决定将韦拔群领导的二十一师拆散,补充到第十九、二十师。这时,红七军北上主力已达7000多人。命韦拔群率领80多个老弱战士带一些残破武器转回东兰,重组第二十一师。韦拔群从革命大局着想,没有一句怨言。

这时的红七军多数是右江儿女,许多干部战士舍不得离开韦拔群,有的坚决要求与韦拔群一同留下。韦国清、谢扶民、覃国翰等红七军老战士回忆说,韦拔群知道了情况后,就主动找这些同志谈心,并在整编大会上作动员报告。韦拔群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必定还会胜利地回到家乡来。”

红七军出发北上之后,韦拔群返回右江与政委陈洪涛等人很快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的赤卫军召集起来,在巴马县组建了红二十一师。随后,便扩充为三个团和两个独立特务营,总共近3000人枪。在每个县,还另外建立了新的赤卫军常备营。

七、三次反“围剿”与“小诸葛”的较量

红二十一师刚成立,就面临严峻的局势。一方面,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各县反动地主武装纷

起,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新桂系参加中原战争失败,退回广西,占据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并准备“围剿”右江根据地。

1931年3月中旬,白崇禧派第十九师师长廖磊率三个正规团及土匪、民团等约一万兵力,以近四比一的优势,向东兰、凤山、恩隆一带“围剿”。

韦拔群不与敌人打大仗硬仗,采取阻击、游击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主动撤出果德、思林、奉议、恩隆、百色、东兰等城镇,将右江党政机关和重要物资转移到西山,并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进山。

桂军占领村镇后找不到人、买不到米,没有菜吃、没有柴烧,还不断受红军和赤卫队伏击。桂军十分恼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搜查山坳岩洞,烧辣椒、烟叶杆来薰逼藏在岩洞中的群众。

红军同群众在非常艰难情况下仍保存着自己的力量。韦拔群还高瞻远瞩地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励右江军民。诗中写道:“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赴恶境,但相信,雾散会天晴!”

5月初,桂军改由韩采凤师来右江,韩采凤由进攻转为防守和围困。

7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到右江,向韦拔群等传达中央决议、指示纠正“立三路线”,提出今后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游击,并将二十一师改为右江独立师,领导人不变。经两个月集训,右江独立师兵分三路,开始新的战斗:一路到黔桂边的天峨、南丹等处;一路南下果德;韦拔群则率师直属营留在西山,坚持以东兰为中心的工作。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韦拔群当选为中央执委。由于关山险阻、战事繁忙,他没有能亲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桂军伙同右江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发动了对东、凤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这时,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武装已不足2000人,处于绝对劣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敌人长达七个月的围困、封锁,红军和群众储备的粮食、油盐早已耗尽,毫无补给,病人也逐渐增加,缺医缺

药,死者又无处安葬。有些人动摇成为叛徒,助纣为虐。

韦拔群、陈洪涛在西山召集师党委特别常委会议,决定整顿和缩小队伍,组成若干除奸团,分散到各地活动。韦拔群在西山南部集中了600多瑶族青年组成一个独立营就地坚持斗争。

桂系军阀反复“搜剿”始终找不到韦拔群等人,于是悬赏银1万和5000取韦拔群、陈洪涛首级。

1932年6月,韦拔群次子韦述宗等三人去香港找上级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柳州。接着,韦拔群的两个同胞兄弟也相继牺牲。

1932年8月,白崇禧出动了张发奎第四军和廖磊第七军,加上各县民团共1万多人,为当时红军兵力的10倍以上。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展开空前残酷的“围剿”。10月初,白崇禧坐镇柳州,亲自策划、指挥,实施“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烧光了所有村子,饮水投毒,搜去了红军埋藏的弹药与粮食,把没来得及撤走的农民集中管制,不许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要使韦拔群和他的部队不击自败,不战自灭。面对极端严酷的现实,韦拔群依靠群众,以西山为依托,与敌人进行周旋。

正当敌人在西山集中“搜剿”的时候,韦拔群却突然出现在敌人直接统治的武篆圩附近一个屯子里。他沿门挨户慰问受难的群众。看见群众在被洗劫一空后,吃着树皮、草根、糠粥,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问一位老人:“能熬得下去吗?”老人坚决地回答:“有红军在,就熬得下去!”

韦拔群听了,深深为之感动。正是这种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使他们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险恶的日子。韦拔群始终没有离开西山,没有离开那里的群众。

八、英范长存

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不幸在病重时被叛徒杀害,时年仅39岁。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万分,群众悄悄掩埋了他的尸体,并且建了一座“红神庙”作祭奠掩护,以表示对这位壮族人民英雄的悼念。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首先提议为韦拔群等的牺牲默哀致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情地谈到韦拔群:“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1957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韦国清等人的谈话。)等等。

1962年,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时,邓小平题词:“韦拔群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的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还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1986年)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他又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作者为广西党史研究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0年8月

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

● 田纪云

今年是深圳特区建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深圳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但这三十年的路并不平坦,恐怕不为人所知。我介绍深圳在最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1989年“风波”后,有一位很负责的领导人公开说,“现在不是办不办特区的问题,是已办的特区骑虎难下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特区纳入治理整顿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特区工作的同志普遍感到方向不明,工作难做,压力很大。为了把五个特区稳住,我提议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深圳召开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当时的想法是,不一定解决多少具体问题,但可以给大家在精神上加以鼓励和支持。

会议于1990年2月5日至8日在深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五个特区的负责同志,有广东、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中我认真听取了五个特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了解了他们的忧虑和困难。

2月8日,我作会议总结讲话,我未采用特区办为我准备的讲话稿子,也没有理会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声音,即席讲了一番肺腑之言。

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经过十年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说:经济特区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增强了,外向型经济比较像个样子了。几个特区的汇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增强了我们办好特区的信心。十年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生产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我们几个特区是这些



1992年田纪云(右)与习仲勋在深圳

变化的集中写照。我看,深圳,还有珠海,可以拿到欧洲参加城市比赛。这种变化,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想到的,外国人也是感到吃惊的。

我又说,办经济特区,是整个改革开放部署中的重要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缩影。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议论特区要不要办了,实践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十三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我强调:“特区要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稳定而不是多变,是发展而不是萎缩,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我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是特区还要继续办好。对此,大家都是举了手的,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反对。

我强调,特区还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特区如果不“特”,不仅难以进一步发展,就是稳住也难。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历史地看,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重申: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引进外资的规定不变,更多地鼓励独资或在老企业基础上

嫁接,对两头在外企业给予更多优惠。在特区工作的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具体化,多办实事和好事,为特区发展开辟道路。不能口头一套,行动上另是一套,更不能朝令夕改。

我要求特区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要立足于特区自身积累的经济实力,发挥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有利条件,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大力开拓外销市场,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特区外向型经济更上一层楼。

我这一番话,是对特区讲的,也是对某些反对办特区的人讲的。因为经济特区是我分管的,会议纪要也是按我的讲话写的,各特区和有关部门也是按照我的讲话办的,不同的声音对会议未产生大的影响。

1991年12月,我又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范围与深圳会议相同。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工业总产值两年翻了一番,产业水平升级,外贸出口比1989年增长近六成,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住房商品化、劳动人事制度、股份制和证

券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改革稳步实施等。

如果说,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稳定、求发展、防倒退的话,那么,这次座谈会主要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求提高、求前进。

会议强调特区要在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断提高水平和档次,并向高新技术发展。同时,要求特区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我呼吁特区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我说,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改革开放反映了我国十一亿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国策。

两次特区工作会议,都与要经济特区下马的观点完全相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特区工作座谈会,在困难时刻对特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 · 好生活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层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80150号

我经手处理的两封李昌来信

● 陈德邻

1950年下半年,我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六区工作,担任六区区委书记,当时经我之手处理过两次李昌同志的信件。第一封信是1950年土改前夕,我带领七个村寨的贫农与李昌同志的母亲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开会斗争了李昌同志的母亲雷田氏。在此之后,雷氏给李昌同志写信告我的状,李昌同志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回信,此信虽然是写给他母亲的,但对我们的土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肯定。大致内容为:1、他已经背叛了他的这个家庭,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让他母亲不要分散他家的财产,等农会成立后,把财产全部交给农会处理。因为这些财产是人民的血汗,理应交回人民。2、虽然他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个家庭,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但从血缘上他们承认他是雷田氏的儿子,在经济上会仍然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区中队把这封信交给我,请示如何处理,我看了这封信后,觉得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有如此高的政治水平,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与支持。于是我便让区政府的秘书把这封信抄写到赶场大街的黑板墙上。用事实说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的根本区别,当时县委书记王彩彰同志到我区检查工作时看到墙上的这封信后,对我们的标题作了指示,他指出,李昌同志的这种认识是党和国家教育的结果,此功劳应归功于党和人民,随后我们就把墙上的标题改了一下。当时这封信的公开对我们土改工作促进很大,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和参加土改工作的热情,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第二封信是在1953年时期,此时我已调任县委组织部,这年湖南省委确定每个专署搞一个丰产区(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土改工作刚结

束,大多数干部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农村参加土改工作的积极分子,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经验不足)我们湘西自治州决定在永顺县塔卧乡搞一个丰产区试点,这是由于塔卧乡是大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省政府所在地,又是当时剿匪与土改的重点乡,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不错。而我又是这个区的老区委书记,于是县委分工确定我去这个区负责搞试点。并在该区成立了代表州、县、区三级政府的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当时工委成员为9人,时任区委书记的杨松柏同志为工委委员。李昌同志的这封信是给湖南省第二书记周惠同志的,内容很简单,大意为“周惠同志延安一别××年,我妹夫给我来信说,我母亲带我六弟的两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他六弟被政府判刑去新疆劳改),我考虑土改已经两年多了,如改造的好,群众没意见,我想接到北京,请周惠同志酌情处理。”周惠同志就在这封信上批示:请陈郁华同志处理(陈当时是州委书记)陈郁华又在这封信上批示:请郭三田同志处理(郭为县委书记)。郭三田同志又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杨松柏同志处理(杨是区委书记)。鉴于当时六区成立了工委,我是工委书记,杨是委员,杨松柏同志就请示我如何办,我当时指示杨松柏同志召集塔卧乡的干部与群众代表开会,将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念给与会者,征求大家的意见,看大家是同意走还是不准走。过了一天,杨松柏回来给我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信上所提问题基本属实,同意让雷田氏带两个孙子去北京。于是就通知雷田氏本人。雷田氏接到通知后,自己花钱雇了八个人,从塔卧将自己和两个孩子抬到永顺县城(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山路崎岖,雷田氏年迈无法行走)然后乘车去了北京。所有行程路费均由他家承担,政府没有负责支付。(作者为山西省文水县离休干部)

深切怀念李昌同志

● 本刊编辑部



李 昌 (1914—2010)

本刊顾问李昌 2010 年 9 月 3 日 11 时 23 分,因病去世,享年 96 岁。本刊同仁表示深切哀悼。

李昌生于 1914 年,原名雷骏随,湖南永顺人。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7 年 2 月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李昌被选为全国民先总队长。“七·七”事变以后,李昌率领民先队总部转战北平、太原、临汾和西安等地,接待平津流亡学生、输送他们上前线参军或到敌后开辟根据地。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民先队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功勋。

1938 年 5 月底,李昌当选为中央青委委员。5 月,由林伯渠安排去武汉,任长江局青委委员。8 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先队,通缉李昌。他遂与周恩来一起去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组织部长约三年。

从 1942 年到 1944 年,李昌任晋西北中共兴县县委副书记、豫鄂边区礼山县委书记、区党委秘书长兼战地服务团团长、枣阳中心县委书记、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教育长等职。

1946 年 5 月,调往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6 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李昌被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由冀晋纵队改编,后番号改为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48 年冬,调回党中央参加筹备重建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市青委书记,华东局青委书记,上海团市委书记,青年团中央书记等工作。1953 年调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经过 11 年时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那个时期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1964 年冬,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75 年 7 月起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副院长、党组书记、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对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 年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担任中纪委书记。

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5 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青年团的建立、改造与重建

● 冯兰瑞

大凡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或熟悉青年运动史的人都会知道,在1936年,共青团曾经改造成为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性质的、团结全体青年抗日的群众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青救会)。原来由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与共产党有同样政治纲领和诉求的、第二党式的共青团被宣布取消。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1949年4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的,于1957年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上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最初是由陈独秀推动,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有八个发起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和叶天底,最年轻的俞秀松(21岁)被推举为书记。此后,北平、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陆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时期,各地青年团的情况有所不同,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团章;有的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有的团组织停止了活动。

1921年,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由他主持整顿和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施存统任书记;接着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规定共青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

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通称为共青团即“C·Y”。青年团这次改名的原因,是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上通过的宣言郑重宣称:“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此前,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底1922年初),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团体“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以此加入中国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在抗战爆发前,共青团进行了改造。从一个相当于第二党的先进青年组织改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这次改造同样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需要。

1935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号召:建立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团结广大青年。共青团要承担这个任务,就必须改造成为团结全国青年开展救亡运动的非党的广泛的群众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个精神,由少共国际传达过来,已是一年之后了。1936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少共国际为共青团改造给中共发来的这份电报。之后,中共中央在11月1日,于陕北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共青团改造的问题。会上做出了:为团结全体青年形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共青团进行改造的决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少共国际电报之所以来迟,是因为1935年12月以前,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完全失去联系。在此期间,少共国际同中国共青团中央联系同样十分困难,上述少共国际的电

报,这边也是分三次收到的(参见郑澆《关于共青团改造的几个问题》,载《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第122页)。

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共青团中央于1936年12月7日发表宣言,宣告改造自己的组织为民族解放性的团体,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于是,团正式实行改造,在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抗日的青年团体,在共产党控制地区,这便是青年救国会(参见李昌《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由此可见,共青团的改造,完全是基于当时抗日救国政治形势的需要。

共青团经过改造,最后取消,取而代之为青救会。这是党中央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又一波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我的老伴李昌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读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后因团组织被破坏逃亡北平而失掉团的关系。1935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高度热情,积极勇敢地投入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要求抗日的大游行,参加了纠察队、先遣队。1936年1月担任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先遣队长,结识了于光远和黄华等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1936年4月他在清华重新入团。一个月后,共青团“彻底”改造,取消了团的组织。对于共青团员的去向,党中央决定,团员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全部“转党”;不够条件的参加群众团体。李昌和一些团员“转党”成为正式共产党员,没有预备期。

改造和取消组织,对于有着光辉历史的共青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在当时至少在平津地区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动。相反的,改造共青团之于当时那一代进步青年,反倒是件大受欢迎的好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团员,谁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这个核心组织?团员“转党”,正合他们的心愿。何况当时还有一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受党中央重视,其影响和作用已远远超过共青团。

1937年10月18日的中共北方局文件《对

青年运动的意见提纲》中载明:“民先队在原则上不取消,必须更广泛。”党中央在同一天发给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称:“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这时,民先队已成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群众的纽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共青团的作用。

时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的李昌,对于共青团的改造这个重大转折,大概也觉得很自然。至于认识到重建青年团的必要,从而提议重建青年团,则是在三四年之后了。

二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青年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青年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名目的救亡团体,如:救国会,歌咏会,读书会……陕北也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1937年4月成立,简称西青救),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西青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指导协调全国青年抗日运动。11月22日大会发表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宣言》。宣言说:“大会要求全国青年男女普遍执行政府(此指国民党政府)的动员号召,潮涌似的投入军队、游击队、建立广泛的少年先锋队、战地工作团等类的自卫组织与服务组织,参加各种抗日的团体和党派,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活动,使抗战建国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以前的1938年5月,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加强党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即中央青委)。当时,临汾已失守,民先总队部迁到西安。接到通知后,李昌从西安去延安参加了中央青委成立会。新成立的中央青委,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李昌是委员之一。会后他回到西安。是年的8月,李昌第三次赴延安,就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长,参加了筹备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的工作。

青救会成立约一年之后,根据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青年工作特别对青救会意见很大,认为青救会干部热情虽高但常自行其是,对党的中心

三

工作配合不力,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还号召建立所谓“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强调青年的特点,维护青年的利益,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公婆打骂……从而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引起家庭不和等等问题。有人认为青救会这个组织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甚至主张将它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青救会的工作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上级党政布置下来的任务繁多,应接不暇。除了边区政府安排反围剿、反扫荡、生产运动等工作之外,中央各部门,如中央军委、青委、妇委、边区或根据地政府各部门也布置工作:如拥军支前、劳动竞赛、民兵训练、办青年农场、青年商店、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扫除文盲、文艺活动、宣传宪政等等,真可谓千头万绪。

作为中央青委组织部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协调、解决青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基层青年干部也常来找他反映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倾诉自己的苦衷。

对此,他曾亲自参与并组织干部去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如绥德、安塞以及晋绥等地区进行调查了解青年工作中的问题。调研的结果表明:

一方面,青救会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如组织散漫,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有些流于形式等等,需要改进。

同时,他也发现青年工作出现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也有一定的责任。表现在缺乏民主作风,不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用行政命令委派青救会的领导人,任意差遣青救会的干部;忽视青年的特点,对青年工作不够关心,等等。

李昌针对他感触较深的一些问题,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讨论:《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39年2月5日)、《青年组织独立性的商榷》(同上,1940年春)、《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同上,1940年6月208期)。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党政干部要关心青年工作,关心青年的特点和利益,要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对青救会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指出青救会在组织上、工作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和缺点,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和措施。这些,在他1940年发表的《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详细论述。

1938年至1941年间的三年中,李昌对边区青年工作的深入了解,也使他对于青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的状况感到忧虑。他考虑到抗日战争已到了“相持阶段”,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刻,共产党没有一个广泛联系青年群众的先进性的组织是不行的。一方面,需要动员广大青年投入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还要和国民党争夺年轻的一代人。共青团改造后,党把联系和动员青年的任务全部移交给了青救会。三年多以来,青救会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青救会毕竟是一个包括全国各阶层青年的非常广泛、松散的群众团体,缺乏坚实的组织力量,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已于1938年停止发展,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而国民党及其青年组织三青团,利用其执政的正统地位,在这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

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之后,李昌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论述当前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认为党必须有一支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队伍,他慎重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他在报告中引用了“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胜利”这句流行的警句。

李昌提议建立青年团的报告送到党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在1940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约了中央青委的几个负责人冯文彬、李昌、宋一平去到他枣园的住处,专门就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说,李昌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仔细听听你们的意见。冯文彬、宋一平让李昌先汇报。

李昌从当前抗日战争的需要、解放区青年救亡运动的不足,谈到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青年的形势,说明建立青年团的必要性。他说:自1938年三青团成立以来,国民党利用舆论机构大加宣扬,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组织上也获得很大的发展。三青团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武装上也得到大力支持。而我们党从共青团改造以后,取而代之的青救会则是一个广泛

的、松散的群众性组织,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与三青团抗衡。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尽快重建青年团,使全国青年运动在党的路线下发展壮大。这个青年团的名称可叫做“民族解放青年团”。李昌汇报后,冯文彬、宋一平做了一些补充。

毛泽东仔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表示理解和支持同志们的想法和要求。他说:目前青年工作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但是建团问题要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后才能决定,希望大家不要着急,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散会时,外面下起了大雨——这一年夏天延安暴雨成灾。警卫员进来说,延河涨水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不要走了,这里睡不下,我就陪你们打麻将吧,等雨停了再走。”于是,他们就留在毛泽东的窑洞打了一夜麻将。

第二天拂晓,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枣园。

党中央对于中央青委李昌关于重建青年团的提议是认真对待的。在1941年6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是否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史称《六四决议》)中,明确否定了李昌关于建团的提议。

这个《六四决议》概述了几年来关于青年工作的若干争论的问题。谈到历史上共青团的作用及其错误时,决议写道:“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和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薄弱的缘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了‘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该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

四

前面提到,李昌于1939年前后发表的那些文章,以及他在1939年和1940年接连两次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一二·九”运动与党的关系问题,十二月九日的游行示威是否“自发”的问题),在党内、特别在中央青

委引起了争论。1940年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在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文章《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就青年工作中存在所谓“第二党”和“先锋主义”工作方式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昌。这篇文章语气较为平和,还说要区别先锋主义和大胆创造的界限,对青年运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同志式的办法去解决。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开始整风运动。中央青委作为试点单位先走一步,1941年初青委内部开始“检讨”,实际上主要是批判李昌,指责他在青年工作中的“第二党”、闹独立性和“先锋主义”错误,并且上纲到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这次“检讨”的结果,在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所著《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中,有系统、充分的反映。这篇发表于1941年5月4日出版的党刊《共产党人》上的长文,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概括为十二条错误。其中第九条批评青年工作中的独立性问题;第十条批评忽视或否认党在青运史上历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第十一、十二条批评所谓的“本位主义”,很明显都是批评李昌的。在第十条批评说:“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定了历史上青年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这当然就是对李昌的直接批评了。

1940年至1943年这个时期,党中央也指责青年工作中犯有“青年主义”的错误。中央分工主管工、青、妇工作的秘书长任弼时也组织人员到边区各地调查青年工作。调查的结论也认为,一些地方青救会曾产生了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群众的“青年主义”倾向。任在1942年至1943年的几次讲话中谈到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时,也批评了边区一级的一些部门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群众团体方面,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与西北局闹独立性,存在着“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

1941年5月前后,中央青委的“检讨”结束,《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六四决议”)下达不久,中央青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派李昌去华北工作的报告。9月,获中央政治局批准。于是

李昌告别了延安，离开中央青委组织部长的岗位，携眷属向华北地区而去。

此后，李昌先从事地方党的工作，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冀晋纵队政治部主任将近三年。1948年，兵团忽接中央调令，调李昌回中央参加筹建青年团的工作。这对于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和兵团政委罗瑞卿等部队首长、对李昌本人，都是出乎意料的。回顾1940年在延安，他满腔热情地向党中央提出重建青年团的建议，被中央1941年的“六四决议”断然否定，他对重建青年团已感绝望。那么，何以现在又要建团了呢？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军人，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服从命令，依依不舍地同三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告别，匆匆到河北省晋县接了我和孩子，一同去到平山县向中央报到，接受任务，积极热情地投入了建团工作。

反倒是我在读他的传记初稿时感到这个转变有些突然。1936年共青团撤销到1949年重建，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对于党史特别是对于青运史研究来说，确是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

五

重建青年团，总的来说也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与几年来青年运动大为削弱，整个解放区的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这种情况有关。

1941年中央书记处做出“六四决议”，建团提议被否定后，青救会的处境更加不妙，工作更加困难，青年工作更加不受重视。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也大为削弱了。在李昌去了华北之后，中央青委机关精简、调整组织机构。中央青委由凯丰、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高朗山五位同志组成，凯丰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不久，冯文彬也去到米脂任县委书记。

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向党闹独立性”、“第二党”等错误，李昌和中央青委的一批干部受到批评，还有不少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青年工作大为削弱，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凡带“青”字号的在生产、武装、文化等方面的青年组织均被取消，许多地方把青救会与工会、妇联、文协等团体合并成立

抗日联合会或抗敌后援会。

1944年5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边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批判青年运动中的“独立性”，批评建立“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的号召是搞“青年化”，对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客观上起了一些消极的作用。社论将边区青年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学习”，说“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在此思想指导下，许多地区把青救会主任、骨干调去从事教育工作，当中小学校长、教员；各解放区、边区的青年组织、青救会处于涣散、取消状态。

1946年，国共谈判失败，统战破裂，内战又起（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解放战争）。解放区群众运动深入开展，需要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组织青年投入到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去。但由于缺少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骨干组织去配合和推动，致使解放区青年运动逐渐消沉，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年5月，中央青委曾找山东解放区青联的代表到延安来汇报。在汇报中，中央青委联系到全国各解放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当时整个解放区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许多地区，如陕甘宁边区取消了青年组织，晋冀鲁豫等地区青救会已经处于无组织无会员状态，青年工作严重滞后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许多解放区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很高，要求进步，而入党还不够条件，又缺少适当的组织可以加入，因此没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具体说，当时全国各解放区共有2000万青年，其中有400万积极分子，大约占20%，中间状态的约占60%。对于众多的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并带动广大青年向共产党靠拢好呢，还是不去组织，让他们在那里彷徨消沉，成为国共争斗的旁观者好？毫无疑问，还是组织起来好。

中央青委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建青年团的时候了。

他们向党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做了汇报。任弼时说：“你们研究一下，在解放区是否建立青年团？”据说在党的七大时，中央青委的同志也曾经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在解放区建立

青年团,当时党中央没有采纳。任弼时说“现在你们再研究一下,是否搞青年团?”

中央青委根据任的指示,围绕要不要建团、建什么样的团等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在向任汇报之后,又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于是,党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建团问题。

书记处讨论建团问题,开了两次会议(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均由任弼时主持。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建团的电稿:《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简称《建团提议》)。会后,于11月5日发到各解放区。

党中央的《建团提议》发出之后,中央青委又在1947年9月召开了全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研究了建团问题。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讲了坚持团的先进性问题。会议具体布置继续扩大试点,大大推动了建团工作。

为了与当时革命的性质、任务相适应,中央决定重建的青年团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很关心建团工作的进展,他在起草中共中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通知时,特别强调了有关准备召开全国团代会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9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草案。解放区各地方党委选派年轻得力的干部组建筹备委员会,在党中央书记任弼时的亲自领导下,积极展开了一系列建团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李昌与我都被选为代表,一起参加了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接见了全体代表,任弼时抱病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的领导机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常委,旋即南下任中央华东局青委书记。1951年10月,中央调李昌回京,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将近15年的曲折坎坷之后,终于重建。李昌在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毛还没有忘记1940年约李昌等人畅谈重建青年团

的事,他笑着对李昌说:“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青年团,你们胜利了!”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青年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大会决定成立共青团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第一书记。(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鸿顺园528信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2010年第10期目录

书屋讲坛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	刘克敌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我见	李良明
流年碎影	仁者光风,有教无类——田长霖、胡秋原眼中的钱伟长	裴高才
	我所知道的《内部未定稿》	罗银胜
	怀念杨丽坤	裴毅然
	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韩 隄
	茅盾谈《鲁迅旧诗新论》及编著者	杨建民
湖湘人物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那代人的信·怕·爱	秦燕春
	密事四记	萧 湘
书林折枝	身卧沙场唯点兵——读张雁翼将军《回望小汤山》	郎森广
	三句话的意思	陈华东
	“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	
	——一位思想史学者视野中的《历史是什么?》	张宝明
	生命因庄严而美丽——读周宁《人间草木》	李 勇
	一个“永远言说不尽的话题”	
	——评段德晋教授新著《主体生成论》	翟志宏
说长论短	《菊次郎的夏天》的B面	谢宗玉
书屋品茗	正本清源说“五四”——读王福湘的《鲁迅与陈独秀》	姜 弘
	关于“沈崇案”及其他	石天河
编读往来	读摩罗的“自审”	邓晓芒
思史佚篇	先秦儒学的内在矛盾	郭铁成
	孔、老之争	姚 前
	风尚·政策·社会变迁——《万历野获编》史料一则解读	李曰强
	元曲的幕后	赵其钧
前言后语	平和温暖 玉润珠圆——序《翁月卿自撰自书作品集》	曹良和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怀念张邦英

● 陈日昇

2010年6月29日13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59年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不久，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张邦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我担任他的专职秘书，直到1968年华北局撤销。我与他朝夕相处了八年，而这八年又正是各项政治运动频发时期。

早年革命 一生坎坷

张邦英1910年5月生，陕西省耀县人，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辈集全家之力，供他读完了小学，又去西安市读了中学。由于受“五四”运动先进思想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节节胜利的影响，1926年16岁的张邦英主动参加当地举行的农民代表和进步青年的会议，开始向农民宣传抗粮、抗税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便担任了私立中学党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向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前线传递党内文件的秘密交通任务。1928年张邦英中学毕业回到耀县，建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1932年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他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运动。1933年参加了杨虎城部队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的率部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组织起第一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他担任党代表，在他的率领下进入陕甘照金革命根据地，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并肩战斗，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征程中，张邦英同志先后在党政机关和

军队中担任过多项重要领导职务，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工作，进行反围剿打击敌人的武装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邦英在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共新疆分局，在党中央第二办公室，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文革”以后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协，在国务院民政部等部门担任过多项领导职务。

张邦英的一生遇到不少坎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在逆境中，他对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不变。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没有到达陕北前，陕甘地区曾一度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被逮捕，有的甚至被错杀。在抓捕的人员名单中也有张邦英，只是尚未动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到了陕北，毛泽东指示“刀下留人”，刘志丹等才被放了出来，张邦英也免遭横祸。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张邦英曾一度受牵连被审查。因为他在陕甘宁边区曾与高岗共事，在高岗领导下工作。在张邦英调北京工作后，有一年东北局张秀山到北京开会，高岗让他给西北来的在北京工作的几位老战友带几袋白面，每人一袋过年包饺子。当时竟有人把此事看做是高岗利用送礼拉拢串联反党。张邦英同志后来说：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就是事实，我相信党，更相信自己，高岗的事他应自己对自己负责，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在后来对张邦英的任用上，还是受到影响，比他参加革命晚的，职务比他低的，都得到了提拔，而张邦英自建国初期，直到离休，四十多年一直是副部级。尽管如此，张邦英不抱怨，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1962年八届全会上，康生向毛主席汇报，说有人利用写小说给高岗翻案。指的就是刘

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该书根据陕北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实情创作的。毛主席为此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为了清查此事,又牵连到一些人,如习仲勋等,张邦英也被牵连进去。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找张邦英查问这本书的情况,张邦英说他不清楚。那位领导还不相信。该书在出版前,作者给张邦英寄过一份清样,请他看看有无不妥之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张邦英也是陕北红军的一位部门领导人,但是却因此受到怀疑。记得那份清样是我收的,在我给张邦英送文件时,把清样放在卷宗里一起呈送给了他。那天整天在开会,下班时张邦英同志原封不动地把卷宗退给了我,也包括那份清样,说明他连看都没有看。这说明张邦英同志讲的“不清楚”确属实情。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1966年8月份,张邦英出面接待到北京大串联、上访的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群众组织数起,来得多的是天津市,其次是河北保定和石家庄、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大专院校学生和工厂企业的职工,整个华北局机关三座大楼全部被占领,成了造反组织设在北京的联络站,一片混乱。华北局书记处已转入“地下”,搬到北京饭店处理日常工作。张邦英不断遭到揪斗。有一次,山西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把他揪到北京水利电力部礼堂,追问1936年从北京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革命老干部是谁同意他们写自首书的,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张邦英笼统回答说:“当时中央知道”。红卫兵又追问:“哪个中央,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张闻天的党中央?”邦英他还是回答:“当时中央知道”。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夜十一点红卫兵翻来覆去逼问,张邦英也翻来覆去回答:“当时中央知道”,多一句话也不说。看到张邦英那种坚持原则的精神,真叫我敬佩。张邦英没有被红卫兵抓住任何诬蔑攻击刘少奇、张闻天的把柄。这时会场上已经乱作一团,有的气急败坏,甚至要动手打人,有的谩骂张邦英,有的看问不出什么结果而泄了气。忽然有几个人把张邦英架走了,说揪回太原去批斗。我赶忙跑过去想拦住他们,无奈他们人多势众,眼看着把张邦英推进了一辆汽车。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回机关向华北局秘书长刘谦汇报,经刘谦同意我立即乘火

车去太原,寻找张邦英下落。在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热情帮助下,派人派车同我一起在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总部找到了张邦英。张邦英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来了,我没事。”我提出接张邦英立即回京。开始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还不同意。我使用一种威胁地口吻说,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谁能承担责任?你们的对立面再把他抢走,出了问题,你们的责任也难逃脱。当时每个单位、每个大学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互相之间打斗辩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混乱极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确实也怕出问题,就同意派了几个红卫兵护送张邦英回到了太原市迎泽宾馆,次日乘火车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1967年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关锋、王力、戚本禹对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说,揭批李立三、苏谦益(均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张邦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是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从此打倒李立三、苏谦益、张邦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批、小会斗,还把他们的秘密扣押在机关,不准回家,不准与外界接触,日夜由造反组织监管。尽管遭到如此迫害,张邦英依然保持平和心态,而且还在关心着别人。他风趣地同看守人员说:你们不用看着我,我不会跑也不会死,没到该死的日子阎王爷不叫我去,你们放心回家睡觉去吧!在批斗会上,逼迫他交代隐瞒历史问题,使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是1936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指示陕西关中特区主力部队三个独立团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率部队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因张邦英原来在这一带打游击,对地形比较熟悉,他与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走在前面带领部队急行军,途中突然与敌军遭遇,边德荣营长不幸中弹牺牲,张邦英带领部队突围继续北上。敌人为了请功,曾在西安东北军办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不仅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三十多年过去了,张邦英万万没有想到,敌人的谣言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审查、被攻击、被打倒的一大历史“证据”。这件事早有结论,事实清楚,造反派无可奈何。

为民困苦忧伤

张邦英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分管农村工作。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那一年,张邦英带队,深入到河北省农村。一进村子看到的种种景象,他的脸上那种同情并带着痛苦的表情立刻显现出来。他说,过去一进村子,是鸡飞、鸭跑、鹅叫、狗吠,现在一进村子是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了;过去工作队一进村,小孩大人会跟着跑前跑后,有说有笑,现在是一个个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一样,都打蔫了。张邦英看到农村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不止一次地说:“把农村搞得太苦了,太苦了……”

张邦英每次下乡都坚持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起劳动,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一看就是出身农民家庭的人。后来开始大办食堂,他总感到有问题。他认为,农忙时办个农忙食堂还可以,便于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办个单身汉食堂也行,方便他们吃饭。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里烟囱冒烟就不对了。他特别不同意“办不办食堂,是占不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办不办食堂,在不在食堂吃饭,应当随人所愿,不能强迫命令。走不动的人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手拄棍子,一手提饭罐子,从食堂打饭回来,歪歪扭扭走在田埂路上,天下着小雨,她又是小脚,一不慎滑倒在地,饭罐子摔碎了,半罐子糊糊撒了一地,老人只好饿一顿。有一位老大爷患病在家,张邦英去看他。一进屋阴森森的,没有一点热乎气,老人肚子鼓鼓的,尿不出尿,今天来看就是患了尿毒症,老人躺在床上,床边一盏小油灯,凳子上放着一碗糊糊,情景十分凄惨。张邦英对老人安慰之后,对村干部们说,像这样的老人应该作为“五保户”管起来,不要让他到食堂吃饭,自己做饭还可以取暖嘛!他认为,不光吃饭有问题,取暖也是问题,不准家家冒烟怎么行?

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张邦英带头在河北省



张邦英(右一)在河北农村同农民一起劳动的情形

邯郸农村蹲点两年多,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和分团长。在他所领导的“四清”工作队没有搞那些类似“秘密工作”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要先“寻根”,再“审根”,再“定根”;什么“培养积极分子”“访贫问苦”,而是进村后连续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文件,把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听取群众呼声,同时更重视有没有事实根据,以事实为基础,以政策为准绳,凡是没有事实为依据的人和事,一概不予触动,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在张邦英领导的各工作队,“四清”运动中没有发生逼供信和打骂人的现象,没有死一个人。有的生产队干部虽有“四不清”问题,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后,只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的,重新取得群众信任,不少人又重新被选为村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村子没有出现反复,没有像有些地方出现的上访现象,翻腾“四清”运动中的案子。可是当时有的领导认为张邦英搞的几个点不彻底,存在“夹生饭”现象,看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存在右倾倾向。张邦英听到这些指责后,不争辩,不计较。张邦英有时只跟我们说一句“让历史做结论吧”。

认真调查研究只唯实不唯上

在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中央要求华北局在内蒙古开垦荒地,建设商品粮基地,每年为

北京、天津提供几十亿斤商品粮。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张邦英的肩上,由他挂帅组织实施。

为了弄清情况,张邦英不顾年迈、酷暑严寒,先后四次深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的数十个旗、县、市,召集干部、群众(特别是牧民群众)座谈会,深入牧场、田间实地勘察。他调查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虽有黄河水可以灌溉,但大部地区干旱少雨,易受风沙侵蚀,粮食产量很低;东部地区虽然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但无霜期太短,年平均只有 90 天左右,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调查研究中他才知道,牧民们和地区干部们普遍反对在牧区开荒。他们说:“牧场是牧民的命根子,开了地上哪儿放牧去!开了地,破坏了草皮,引起‘沙化’怎么办?”张邦英曾在新疆工作过,他深知草原对牧民的重要,弄不好会引起民族矛盾。在内蒙古来说,哪有什么荒地?除了草原,就是森林,就是农田。所谓开垦荒地实际上就是开垦草原,开垦牧场。

张邦英亲自拜会乌兰夫和王震,向他们汇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乌兰夫认为此事不宜进行,说牧民群众不赞成就不好办。他建议,开垦草

原还不如把这份钱投到牧业生产上去,牧民们多养牛、多养羊,上缴国家有肉吃、有奶喝,不是一样嘛!王震也根据他在农垦部当部长的实践经验,支持张邦英不宜垦荒的意见。张邦英向华北局书记处做了汇报,提出不宜在内蒙古开荒种地的意见。终于阻止了这项工作的实行。如果真的在内蒙古开垦几百万亩耕地,破坏了草原,引起了沙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后果将不堪设想。(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文化局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按需出版

2004 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 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 300 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 1—2 个月。重印在 1—2 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 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50 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 50 本(大 32 开)为例,基本费用 200 页 2000 元,300 页 2800 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 4000~4500 元上下(含 2 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 克胶版纸(黑白)、128 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 1 号楼 1509 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痛悼徐孔

● 黎白

我与徐孔同志有65年以上的深厚友谊。尽管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我们都历经坎坷,却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摆脱逆境后,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很想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却总是回忆往事就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几个月后,心情稍有稳定,才决心动笔,以缅怀老同学、老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不久,徐孔也来到文学系学习。我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学历也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我却天真、调皮,与大家感情都很好。

我到联大学习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与父母弟弟妹妹全家都到了解放区——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我父亲是有名的土木桥梁专家,为修建康庄大桥而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工程师”光荣称号。我们一家到解放区就如鱼得水,十分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区。徐孔来自东北辽宁,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权都毫无认识,很有一点“冷眼向阳观世界”的

观察、探索念头,还谈不上是投奔革命。

这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有位赵克前同志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愤怒地指责了进入东三省的苏联红军的打砸抢,搬走大工厂设备运回苏联等等,并说东北人民经历了长期“满洲国”及日本统治,无不恨日本入骨,谁想到苏联红军一来就打砸抢,看来“大鼻子老毛子和小鼻子矮鬼子差不多,都不是好东西……”。

赵克前的发言首先引起了从延安来的同学无比愤怒。严厉斥责。赵克前不服,延安来的同学也更加愤怒,发言中扣了不少十分尖锐的帽子,例如“汉奸”、“叛徒”、“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就是反共产国际”……其实也难怪延安来的同志,他们刚刚经历了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及抢救运动,扣大帽子也习以为常,而素来发言直爽的徐孔却一言不发。我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苏联好,斯大林好,苏联红军当然也很好,赵克前同学是有极端偏见的。但是,延安来的同学对他的批判太蛮横了,赵克前从东北来,总是会有目睹感受的。我悄悄问徐孔:“你看呢?”徐孔说:“他的发言都是有事实的,并没错。只是把苏联红军

和日本鬼子等同看很是过分了。”我问:“你怎么不发言呢?”徐孔说:“我怎么发言?我表示支持赵克前的发言?不是火上浇油吗?延安来的同学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扣帽子不嫌少,气势汹汹,难道延安整风就是这样整的吗?”

赵克前坚持己见,毫不认错。会上成了僵局。文学系主任陈企霞同志讲话了。他说:“赵克前同学讲的也是事实,苏联红军也不是绝对纪律严明的。苏联红军打进德国,也搬走了德国的许多大工业。但由此产生对苏共、对斯大林的反对的看法嘛!赵克前讲的是有些红军在我国东三省有违纪行为,并没有讲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什么嘛!讨论会上发言,言者无罪嘛!”

陈企霞系主任公平地平息了这一场大争论。事后,徐孔对我说:“联大、文学系、陈企霞都很不错。我看么,好学校、好解放区、我找对门路了!”

后来我曾想过,徐孔到解放区是来观察的,是来看能不能使自己放心入校,放心投革命的,这和我经历不同,他的慎重是必要的。

1946年,我们联大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例如参加边区

参议员的提名和民主大竞选。参加了边区的土改活动,深入农村。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们从山西千里行军转移到河北省冀中根据地。每天行军几十里,对许多大城市来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绝大多数同学在政治上都是坚定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但在体力上又多数是吃不消的。我年龄最小,体力最弱,我的背包是徐孔一直替我背了千里路,直至到达目的地的。这件事使我终身不忘。

1947年7月,我在文学系担任学员第六组组长。不久入党。当时,学校党组织是秘密的。许多同学都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徐孔也还没有入党。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政治部担任秘书,徐孔留在学校做研究生。我们第一次分手了。不久,徐孔也被分配到军区二十兵团。后来又和我先后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徐孔停战后才回到祖国,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他几次回国都和我一起研究这部作品的创作,结构安排等等。完成稿也由我向出版社推荐。并经出版社审定准备出版。当时,我已调离军区,在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我认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文艺作品只有寒风同志所著的《东线》是已出版的优秀作品。徐孔的作品也是有生活有水平的,是可以出版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徐孔回国后,由于诬陷被打成右派,他当然毫无思想准备而申诉,却仍被划为右派分子,更由于他不服而申诉又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军籍党籍,到农场去劳改。从此,经历了22年的无妄的、灭顶的灾难。原准备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向我提出徐孔已被划为右派,不能出版他的作品。后来告诉我,如果加上我的名字,成为合作还可以出版。我当然拒绝了,因为这部作品我一个字也没写么。徐孔认为能合作出版也好,总能算是收获,也可以得到一笔稿酬来应付突变,来养家么。谁知出版社又通知我,联名出版也不成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出版才能批准。我当然不能贪天之功,只好拒绝了。

徐孔在农场改造了几年后被放回他故乡,成为“摘帽右派”,劳动改造。

在反右派运动中,文艺界第一件大案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文艺学院副院长艾青,美术系主任江丰等同志也被划为右派。我和文学系同学徐光耀已是总政创作室专业作家,被作家协会负责人点了名,定性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队内部的骨干分子”。结果徐光耀被划为右派,我本来也被划为右派,由于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没有同意,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定为中右分子。下放昆明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教育改造。我离京前,徐孔几次来我家,彼此悲痛,不服,却又无可奈何。好在我并没有行政处分,

工资照发,才能在经济上对徐孔稍有支持,精神上,只能“相濡以沫”了。

此后,我比徐孔幸运得太多了。我受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后不久,听说刘少奇同志有指示:说什么叫中右分子?一律平反!我被调回北京,总政治部两位部长李伟、陈亚丁当面向我道歉,并表示正式平反,不留反右时期档案。并向我了解总政创作室所划定的右派分子的情况。我表示完全划错了,都不应划定右派或给予处分。他们也记得很详细,表示也要解决,不久,听说毛主席指示:右派分子不准平反。徐孔当然也不可能平反了,只好在家乡接受“改造”。

徐孔返家后,他在家乡辈份颇高,又是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所以,乡亲们并不把他当敌人看待。很为热情,很为尊重。他有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条件,就更用心修改他的作品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还能尽力给他一些帮助和支持。

徐孔为人本来就比较沉默寡言,认真执著,受到如此严重冤屈,仍不停坚持创作。

22年灾难终于过去了。中央决定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右派分子中几乎全部得到改正。徐孔在笔耕不停的精神支持下,终于恢复了党籍。在京安排了工作。

徐孔来京后创办了《中国食品报》。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创举。他担任了总编辑。退休后徐孔参与创办闻名海内外的刊物《炎黄春秋》,在社长杜

导正同志的领导下,负担整个全面办刊工作。杜导正同志也曾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们向我约稿,我是无法推托,责无旁贷的。2009年《炎黄春秋》发表我写的《缅怀萧克老将军》,就是徐孔向我约稿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徐孔同志确实不算是一位名人,但确实是一位高尚的人、无私的人,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一生的人。

(作者为军旅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秦晖金雁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 扬	32.00	7.00
张闻天图册	张培森主编	260.00	10.00
张闻天在 1935 ~ 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吴江文稿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若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	于光远	36.00	7.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三野名将、四野名将》本书作者发掘了许多史料、揭秘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大胆还原高级将领的本色人生,并配以百余幅珍贵照片,展示了将军们的生命境遇。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作者为直言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吴思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 杜导正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特区的建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注的事情。8月20—21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并发表了讲话。9月6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的庆典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发表了讲话。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为海内外热议。我们一些老朋友们见面，也离不开这个话题。我的一些想法，被一位“忘年交”老朋友以“答客问”形式整理出来。我看了以后，觉得还有点意思，索性发表出来，和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们交换意见。

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新一波争论又起来了。很多人都在议论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您怎么看？

答：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引起关注，在我看来，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温家宝在深圳不管是正式讲话还是参观考察当中即席讲话，都多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把现在的阶段称之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我看很有道理。改革开放有32

年的历史了，深圳特区也到“而立之年”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跟当年邓小平“南巡”前一样，深圳往何处去，实际上就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认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温家宝同志把全面、持续地推进改革的关键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看是牵到了牛鼻子。近两年来，中央的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代表了国家领导人对历史大势判断的高水平。

客：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对温家宝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他几年来说的很多，但实行的很少，是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说他“作秀”，我有不同的看法。

“作秀”，不就是在人前表现吗？从更宽泛的方面来理解，一个领导人在公众面前，或者在外交场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作秀”的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那是因为中央领导这样说话的人少。如果中央领导同志里多一些人天天讲这样的话，天天做这样的“秀”，那就是一个大好事。阳光政治嘛，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比起暗箱操作来是巨大的进步。

客：人们说温家宝“作秀”，还有一层意思，说他讲话很好，但实施的少。

答：我觉得他是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在行动上，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不仅是旗帜鲜明的，他也是大有功劳的。他的作风非常亲民务实，大雪、地震、洪水，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线，他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

问,记忆力又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识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基础的。

温家宝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恐怕不是偶然的。我看,一方面是他认识到中国改革到今天的困境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看这个评语很中肯。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支持,创造条件让他施展才干,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政治改革的主张,维护政治改革的力量。

客:可是,很多人注意到,与温家宝的讲话相比,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没有几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两人的看法似乎略有不同。

答:这种说法我不大赞成。我是一个在党内生活七十多年的党员了,从中共的体制上来说,温家宝的讲话应当是代表中央的精神。温家宝和胡锦涛两人强调的侧重点可以有不同,但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也曾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民主。2007年胡锦涛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2005年,胡锦涛对省级干部说,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到他这次在深圳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特别提到:未来必须坚持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虽然没有像温家宝那样突出政治改革,但对改革、对特区先行先试的强调,也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嘛。另外,胡锦涛是总书记,讲话也更宽泛,全面照顾到改革的各个方面也是很自然的。

我在一家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温家宝不是曲高和寡的布道者,胡锦涛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掌舵者。很多期待改革的中国人相信:胡锦涛与温家宝共同拥有耀邦情怀,表明他们的努力不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而是在分进合击,要共同击倒政治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共同开启中国变局的大幕。”这段话可以代表我的看法。

客:伴随着深圳特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前后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这次在深圳特区的“而立之年”,围绕着温家宝和胡锦涛的讲话,又出现了诸多的争论。您怎么看?

答:8月26日,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9月4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文章提出,在回答“由谁统治”、“如何统治”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文章例举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认为其“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我想,这样的言论不能代表中央精神,更不能代表民意。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你注意到《南方日报》的言论没有?9月6日的《南方日报》除了特区三十周年的30个版的特刊外,还有整版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评论,名为“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标题分别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它各项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区未来改革发展开局突破口》、《要在实现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等四篇署名文章。呼应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对政治体制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我认为,《南方日报》的言论表达了中央的精神,是代表了民意的。

我们当然支持《南方日报》的观点。而且我相信,既然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坚定,就可以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种共识就是,继续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姓资姓社的诘难,像温家宝所说的那样:“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结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

● 穆广仁

本文仅就反右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在6个不同层面的运作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估,希望以此求教于专家学者。反右运动开始于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是主要的),但它涉及了六个不同层面。

第一,反右斗争一开始是从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党派人士发轫的。除少数“特许受保护者”之外,几乎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被打成“右派”,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把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排除政权之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消灭任何有独立特征的民主党派和各种政治集团,把共同纲领的联合执政转化为一党专政,这是反右斗争中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层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过程中,暂时需要联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那时毛泽东对他们也是很不放心的。民主党派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既有亲共、联共者,也有疑共者。在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系列文章中,毛就借批判美帝国主义之名,重重敲打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称他们为“中间派和右派”。其所指者,正是民主党派、非党的民主人士,不只是疑共者,也包括亲共、联共者。可以说,在联合民主党派之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地“反右派”了。到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废除共同纲领,把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陆续排除出政权机构;到1957年“反右斗争”,公开、全面排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成了人民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转化。

第二,整肃、镇压党内外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艺术家、教授、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的精英。这是“反右运动”数量最大、影响深远的层面。此前,已有“思想改造”运动、

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马寅初、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名目不一,都是整知识分子。但毕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则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的一次“全面大清算”。

理论上,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通过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战胜、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其矛头即针对知识分子。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他急于超越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是从经济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灭资”的革命战略。

毛泽东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兴造文字狱,建立了舆论一律体制,形成思想专政、文化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剿知识分子是反右运动的思想文化层面。知识分子较多接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潮影响,而毛泽东只是把自由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反右斗争奠定了统治全国的思想文化专政,而思想文化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剪除各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由原国统区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力量。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三个层面。在解放初期,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各地区地下党分别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名义遭到清洗。其中的领导干部,尤其被视为“心腹之患”。1957年8月,毛泽东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党内有纳吉”,就预示着反右斗争是包括党内领导干部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举浙江沙文汉的例子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浙江省长沙文汉,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原南

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解放后依次降为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首先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和浙江省委领导干部杨思一(副省长,原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彭瑞林、孙章录(原苏浙皖边区工委副书记)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四人之外,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原地下党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下属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领导人郑伯克,在1954年就被扣上“最恶劣的地方主义”帽子加以批判。1957年开始,云南大量地下党和边纵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进行“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把省管干部158人,其中原地下党和边纵干部122人全部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原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后改编为解放军滇桂黔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被反复批斗,划为“右派分子”。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原滇桂黔边区省委常委)、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

四川地下党拥有大量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并建立和发展了华蓥山武装斗争根据地。但在解放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这支力量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反右斗争就是大规模迫害地下党的一次。地下党老党员张文澄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有地下党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被划为右派。这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赵唯(1935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廖林生(原川南工委书记)、范硕默(原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等多人。他们中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过是对省委那个一把手提了些意见,或者对省委歧视地下党干部表示了不满。

在大军解放四川(其他新解放的地区也一样)之后,一直存在“地上”与“地下”,“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靠农民革命打天下和坐天下,新政权必须由“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掌管,不容各地方地下党人置身其间。而“地方主义”就是用来剪除地方干部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的武器。

第四,为贯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冒进”的极左路线,清洗各级党政机关中“反冒进”的领导人,这是反右斗争中常被忽略的一个层面。在50年代后半段,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路线斗争交叉进行的。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1958年1月到4月,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广州会议上,严厉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保守思想,批判跟不上他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主张,得到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的支持,却使毛泽东大为光火。在南宁会议上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他认为,党内反右运动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随之在全国开展了一个“反反冒进”运动,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打成右派。在成都会议上他点了广东、广西、安徽、山东、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八个省区的名。

1958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效春、省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副厅长陈仁刚等人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等人的“罪过”,是不同意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对反右倾运动的后果,不同意用“成绩是主要的”来评价。1958年2月,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及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梁大钧、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等人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集团。孙殿才等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过急的左倾错误,造成农业减产,虚报粮食增产的歪风;并主张允许种自留地等“小自由”措施等。他们被批评为“反对社会主义、保护资本主义”。以类似理由或对领导工作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反党集团”的还有:广西以副省长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副检察长许江萍等人);山东省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河北省常委刘洪涛、省工会主席杜存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副省长冯白

驹,此前就已被戴上“地方主义”的帽子,现又加戴“右派”帽子。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帽子大小尺寸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反反冒进”斗争、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人,为推行左倾冒进路线所采取的清党措施。实际上,在党内领导层开展反右派斗争,既是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也是为后来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作出的政治铺垫。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领袖专政。

第五,硬性规定把基层各单位人员中的百分之几划为右派。原来规定小学、中专、农村不抓右派,实际上都已突破。为达标而被划为右派的,大量的的是并无明显政治倾向、在政治生活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是与反右斗争原定的堂而皇之的“目标”毫不相干、与上面规定的“右派标准”也挂不上钩的一个层面。他们被划成右派,或者是由于响应党整顿作风的号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提了些改进工作作风的建议,或者是对基层单位领导人提了些鸡毛蒜皮的意见;甚至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意见,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组织上为了凑足或赶超划定右派的百分比。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估计:右派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这种运用指标指挥运动,是最高领袖以运动治党、运动治国的一贯做法。这种百分比是无根据的主观判断,却使大批无辜者蒙冤。

第六,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有关材料,还有大约140多万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列为“中右分子”。这些人大概是“候补右派”。其中许多人在批斗之后,或者处以党内、行政处分,或采取严格的控制使用。他们因免于戴上右派帽子,还自额手称庆,连忙深刻检讨自己,誓言改造思想,作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以求自保。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若明若暗的层面。

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也许,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新华社,在钦定的大右派李慎之之后,有一大串的名记者(如戴煌)、名编辑(如庄

重)、名翻译(如董乐山)等被列入右派名单。在这个名单上没有排上队的,就只能算是“中右”了。大概,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刚从地方上调来新华社,根据毛主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句话,打算把我派到国外(科伦坡)当记者。我已经办妥了护照、黄皮书(出国检疫文件),做好一切出国准备。只因我在鸣放中写了一张主张新华社也应“民主办社”的大字报,在主编的墙报上集纳了一些街谈巷议,被批判为“严重丧失立场”,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去科伦坡的任务也被取消了。

这140万人并未公开计入反右斗争的“辉煌战果”,只是组织上的统计,他们本人并不知晓已被列入“中右”另册,存入档案。正如人们流传的一句名言:“帽子拿在手中”,像冥冥中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这些被批斗后打入另册的人,包括许多并没有在运动中直接受冲击的人,全都不知道自己头上有没有悬着的利剑。因此,那威力震慑着的不只是右派,还震慑着未列入右派的广大人群。这是反右斗争的“副产品”,是隐而不见的一种威慑。营造威慑下的恐惧,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的必要条件。

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61万多人。(据郭道晖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正式被划定的右派外,还有一批没有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他们并未列入党委核定的右派名单,但其待遇等同正式划定的右派,照样送去劳动改造,照样忍受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我的一位在南京的老战友,在运动中被批判为右派,但上级党委并未作出核定他为右派的结论,他就稀里糊涂当了20多年的右派。有人戏称之为“编外右派”。这类编外右派究竟有多少人,已无从查考。

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政。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 李维民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的萧功秦先生写的《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以下简称萧文),一开篇就提出:“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还说:“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这两者都是属于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了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作者提出通过研究清末“新政”来得到启示,这是很必要的;然而,作者得到的启示,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粉饰门面、欺骗群众的清末“新政”

萧文说,清末“新政”做成了“多得多的改革事业”,实际上,清末“新政”所做的,真正能称上“改革事业”的没有几件。“新政”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改革,而是继续保持专制统治。用血腥手段镇压了1898年维新运动的慈禧太后,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后,面临反清运动蓬勃兴起,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独裁统治,决定集中对付革命势力,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实行变法。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抵制革命、安定民心的必要,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

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

虽然“新政”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办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和改革军制、建立新军等,但是,坚持独裁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当局,正事也会做歪,好事也会办坏。例如鼓励私人资本,只不过是按照商人投资数额的多少,给以不同的官衔,并没有什么保护私人资本的实际措施。对发展私人资本的种种妨害,包括捐税繁重,关卡林立,以及外国商品倾销,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一切依然如故。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毫无改变,各地官员利用“新政”的名义,加捐派税,横征暴敛,大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因而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

废科举办学堂,本来是件应得民心的好事,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但是,各地的学堂多半在地方绅士的控制下,并不真讲“新学”,而且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舞弊,因而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浙江上虞县人民曾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这类事件在许多省份屡有发生。虽然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但同时突显了人民群众对专制腐败清廷的对抗和仇恨。

作为“新政”主要内容的组建新军、创办巡警,其真实目的是强化统治人民的机构,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慈禧太后曾密谕军机

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因建新军筹饷练兵加重人民负担自不待言,为办巡警各省还开办了十分繁重的警捐,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河北遵化县农民一万余人,为此曾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

也算一种“新政”的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各地成立由地主绅士把持的“自治局”,官绅结合,更多地向群众勒索。1908年8月,清廷下令要调查户口,各地借调查户口、钉门牌,按户敛钱,骚扰群众,激起苏、浙、皖、闽、赣、粤等省群众普遍反抗。江苏如皋县乡民集合数千人,索要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

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清末所谓“新政”的发展实业,主要是开矿山、修铁路。这些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搞起来的,后来陆续有所发展,在“新政”时期并无什么突出成绩。突出的倒是在这个时期反对清朝当局出卖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矿山和铁路而引发的收回权利的爱国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要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在矿权、路权方面这种矛盾最为突出,因而在许多省份连续发生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

1905至1907年发生的江浙两省争路权的斗争,是个典型的例子。江浙两省的绅商,分别

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兴建从上海经嘉兴、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借口七八年前英商曾与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过一个内容含糊而且没有什么合法效力的草合同,坚持要按这个草合同办。腐败无能的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稍稍改了个办法,让英国资本借钱给清朝政府,再转借给江浙铁路公司,英国资本通过清朝政府操纵这条铁路,以英商资本为主,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清朝政府如此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抗议。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要求罢盛宣怀的官,而清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清朝政府不愿意在它的控制之外由民间“商办”铁路,因为这将会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而帝国主义者愿意通过清廷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双方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清朝从督抚以下层层官员,还直接插手这些商办公司,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1908年5月,清廷又借口商办公司不得力,要改为官办,实际就是靠借外债,把主权出卖给外商。1911年4月11日,清廷又发布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的意愿,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

萧文说:“五花八门的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现在看来基本正确的国策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当时的国家,并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贪腐的清朝政府,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利益。所谓路权国有,实际是剥夺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以四川的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运动发展成全川罢市、罢课的爱国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911年7月15日清晨,突然把领导保路运动的9位绅士拘捕起来。当天中午,几千愤怒的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捕人士,赵尔丰竟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30多人。从此,温和的保路运动,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成为促进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新政”激起的群

众反抗斗争,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腐朽、卖国、只能带给人民灾难的形象,从而导致清朝的彻底灭亡。

清末“新政”的破产,不是因为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而是因为改革太晚、太慢、太假了

萧文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是由于“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的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执政者陷入权威危机,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因而导致失败。这就是说,清末“新政”的破产,是因为改革的幅度太大了,速度太快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清末的改革搞得太晚、太慢、也太假了,所以导致“新政”的破产和清朝的灭亡。

所谓“新政”,是始于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的变法诏。那时她还在西安避难,主要是为了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不是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以求得到列强的支持。她讲的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重弹,遵循的都是洋务派的纲领,并不是要完成1898年维新派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她在变法诏中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表示与维新派划清界限。并且强调变法是在坚持“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根本原则下,改变某些方法,根本没有提到立宪的问题。

所谓“新政”只是徒有其名,清朝大臣盛宣怀为朝廷草拟的致列强政府的国书,在正式发出时,也把“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清末的“新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而是为了抵制革命,继续其皇权统治的弥缝之计。

预备立宪的问题是迟至1904年才提到日程上来的。这一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让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任意屠杀蹂躏,从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战争的结果是专制凶横的俄国竟然败给了小小的日本。立宪派断言,这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仍然实行专制的俄国,因此纷纷要求清廷实行立宪。一些清朝官员也上折奏清立宪,而且说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还可保“皇权永固”,从而消灭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才松了个口,派五个大臣于1905年底启程去外国考察政治。1906年听了五大臣的汇报后,于7月13日发布了一个“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在这个谕旨中,不但肯定了“大权统于朝廷”的原则,还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什么时候实行立宪还不能定,先从裁定官制着手,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实际上这个谕旨不过是力图拖延实行立宪的空洞诺言。这个谕旨下达后,进行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因为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朝统治集团的权威受到很大削弱,慈禧太后企图利用预备立宪的机会,收回它失去的权力,加强中央专制的力量。同时削弱汉官的权力,加强满人的优势。清廷的各种势力经过几个月的较量,慈禧太后在11月6日公布了最后裁定的新官制案,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新增一个邮传部以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立宪派所期望的责任内阁,连提都没有提,预定要设立的资政院,也不知何时才能成立。对于涉及皇室大权及满族亲贵利害的各衙门,则明确声明不予更动。

官制案公布后的第二天,重新任命的各部院大臣的结果是,在十一个部院中、汉4、满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

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与改革背道而驰,连立宪派和部分同情立宪派的清朝官员都大为不满。

清廷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至1908年两年内,对于立宪一直拖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主要精力还是用于镇压革命党和人民群众的反清运动。1907年8月,清朝当局发了一个上谕,说:“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一个月后又下令各省的督抚,在省会设立谘议局。然而又拖了将近一年,才公布谘议局的章程。1908年8月,清廷搞了一个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可是仅仅两个多月后,慈禧太后就病死了。直到清朝灭亡,议会也没有成立,国会也没有开成,宪法也没有颁布。

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立宪的进度,萧文还认为速度太快了,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那种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胡绳同志曾说过:慈禧太后“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在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她为应付革命的危机,还安排好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把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60页)我认为胡绳的这一断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908年10月慈禧病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三岁的溥仪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实际上执政的是他的父亲载沣。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1909年9月各省的谘议局成立,又拖了一年,北京的谘议院才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被说成是为议会奠基础,实际上不过是个谘询机关。省谘议局说要选举,但是规定了种种条件,妇女全部排斥在外,贫农、中农和部分富农、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全部

排斥在外,只有地主、绅士、大商人和学界的头面人物,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据统计,各省登记合格的选举人,还占不到各省人口总数的1%,最多的是0.62%,最少的只占0.2%。如黑龙江全省的选举人只有4600人。1910年成立的资政院,还不如各省的谘议局。在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由三岁皇帝“钦定”的。其中80人是“宗室王公世爵”和“各部院衙门官”。另一半100人是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推选后再经各省督抚核定的。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都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成立后到清朝灭亡前只开过一次会。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的3月,成立了所谓新内阁。13个大臣中有8个是满族人,其中5个是皇族。小皇帝的叔祖父,以收取贿赂、卖官鬻爵著称的奕劻当了总理大臣。如此荒诞的“新政”,既算不上政治改革,更谈不到民主。萧文说“大幅度的急剧改革”、“政治超前”,导致改革失败以致清朝灭亡。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腐朽的统治,从千方百计地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到玩弄虚伪骗人的“新政”把戏,以致完全失去民心,遭到全国各阶层群众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260年清王朝的彻底灭亡。

从清末“新政”的失败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

萧文说“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这话说得不错,但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萧文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是由于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萧文提出我们当前的改革应当走小步、走慢步,这并不错。问题在于幅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怎样去衡量。政治改革的幅度和速度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好计算,不过,根据各种因素综合比较,在人们的心里还是有把尺子的,这就像长年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心里有个东西南北的方向感一样。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或者说步子太小,速度过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笼统地不好评判,那就举个例子

吧。譬如民主选举,这是100多年前巴黎公社定下的规矩,我们党也是提倡的,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件事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的选举制度和办法,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倡导民主选举,而直选是最能准确表达群众意愿的形式。至今30年了,仅仅完成了村官的直选(且不说选举中的弊端还很严重)。照此进度,乡镇级、县级、地市级、省市级,如果都要30年,那么全国直选要一二百年之后。这速度是快是慢,恐怕不用什么标准衡量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哪一级都不需要直选,不过至今在中央文件和首长报告中还找不到这种说法。我们党有个做计划、定指标的传统,不仅是GDP等涉及经济方面的计划指标,政治方面的计划指标也是有的。譬如公安局抓人,过去就有计划指标,现在也还有没有指标的指标。譬如,在严打中,某个区抓了多少多少人,立即大会表扬、通报嘉奖,别的区就得比着学、跟着干,和有指标差不多。在政治改革方面,倒是需要有一点计划和指标,但现在很少见到。

萧文说:“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的平台而显现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对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浇油。”这意思就是:民主改革不要公开地搞;如果矛盾不能解决就不要去解决,还是捂着、压着、拖着便于稳定。当年慈禧太后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能压就压,能拖就拖,一直拖到清朝彻底灭亡。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

萧文的上述论断,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形势的如下判断:“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应该说是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所带来的权威流失的。总体上来说,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我以为很值得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肯定,这是事实;因而使执政者的权威有所增加,这也不错。然而,不能因此而忽视腐败和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的危害性。破坏比建设

的能量不知要大多少倍,用十分努力建立起来的威信(积极因素),有可能被一分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消极因素)摧垮。中国当政者因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而赢得的权威,完全可能被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抵消。两者相比,恐怕不是增值而是贬值。

萧文还说:“与80年末相比,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曾多年为著名的富布斯杂志做中国富豪榜的胡润先生说,1999年首次推出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时,个人财富达到600万美元的就可以上榜,那时只有50人上榜。2007年上富豪榜的门槛提高到一亿美元,却有500人上榜。2009年的门槛相当于三亿美元,有400个富豪上榜,其中40位达到十亿美元。另有一项统计说,2008年中国大陆拥有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的富翁有30万人,占全国人口0.023%的这30万富翁,共持有8.8万亿资产,“相当于2008年中国全年GDP30万亿元的29%”。还有很多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年来,我国的两极分化程度,不是比过去下降了,而是比过去扩大了。掩盖现实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不但不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酿成更严重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清朝统治集团拒绝、阻挠、拖延政治改革以致灭亡的教训,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脚踏实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这是研究者的心愿和企盼。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本刊今年第6期第74页左栏第13、14行“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句应为海涅所言,不是马克思;第8期第25页左栏第9、10行“我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应为“我的第八届党代会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第46页右栏第15行“陈国栋部长传达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精神”应为“八届七中全会”。

“周惠谈话”辨伪

● 韩 钢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

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

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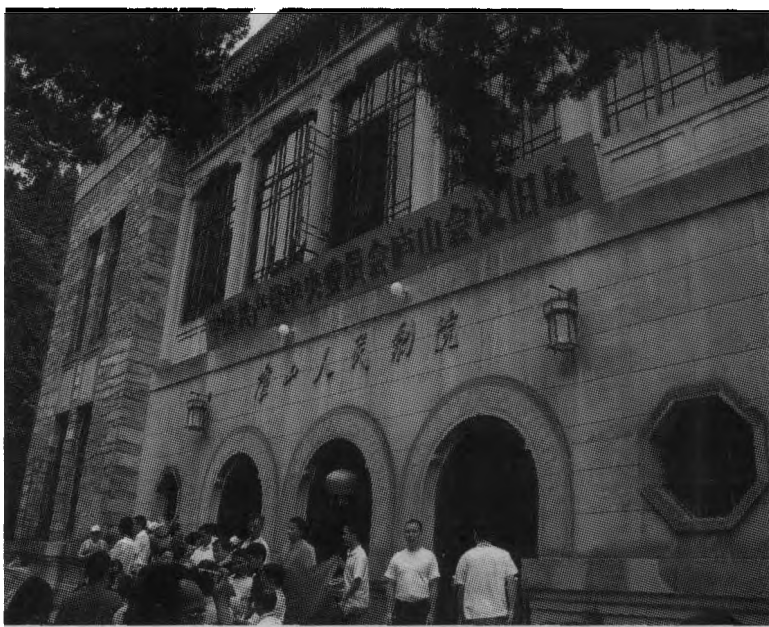
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



庐山会议旧址

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

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也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

(《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庐山会议实录》,第285-286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别有用心。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动”的?

据李锐回忆,他是8月11日上午交出检讨的,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关于这一点,李锐在书中已有回忆,坦承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谈话”称,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发言,让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

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人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周、周、李而言,庐山会议期间最要害的问题,是7月23日之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议论。揭出这个问题,才是二周(其实也包括李锐)“陷入极大的被动”的关键。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

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完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最重要的真实情况”都揭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陷入极大的被动”呢?可以肯定,对周小舟、周惠(无疑也包括李锐)而言,8月10日才是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他们正是在这天“陷入极大的被动”的;而李锐第二天才写检讨,显然与此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件事,“谈话”称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夜闯美庐,跪在毛的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出自张的手笔,而张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还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说受了毛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这番叙述,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简直就是一幕电影。这恐怕是“谈话”披露的最耸人听闻的“史实”了!可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史实”。据“谈话”称,此事是周惠听周小舟说的,周小舟又是听田家英说的。田、周、周均已作古,这

耸人听闻的“史实”竟死无对证！

问题还在于，“谈话”的叙述完全站不住脚。按“谈话”的说法，李锐“夜闯美庐”是在他写检讨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如果是前两天，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还没揭出来。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的主持者当即与各小组组长商定，当天晚上各小组继续开会，分别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锐正在小组会上受到追查和批判，如何“夜闯美庐”呢？难道有“分身术”不成？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

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不符合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事实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毛泽东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锐写检讨之前早已扣上。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

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日)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

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做“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彭

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能够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因此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这才是庐山变故的深刻教训。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应该补充的是,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恐怖的“红八月”

● 王友琴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

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

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

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清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

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

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

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

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衡(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脖子自戕，幸而未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四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

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

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三三

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他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许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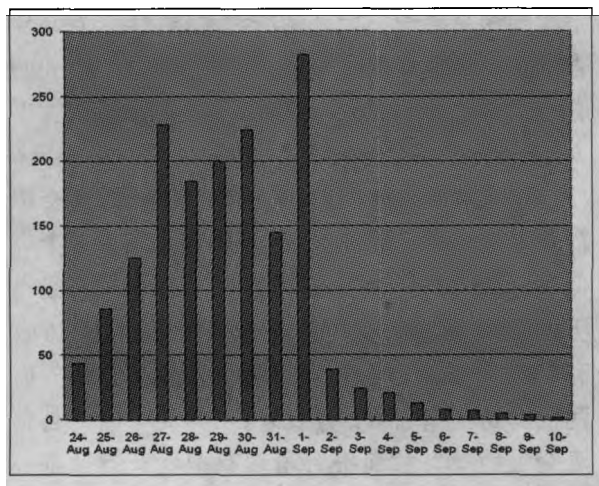
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统治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 赵宗礼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偕夫人刘桂香、二儿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一起跳进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里，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杀身亡。后因毕剑增抓住井里汲水的水车链子爬出来后，到县委院里大喊“救人”，刘桂香先被救出（后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旋即上吊自杀），44岁的毕可旦及3个女儿溺水身亡。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全国的“唐河事件”或“毕可旦事件”。

当天，唐河县委向南阳地委呈报了“关于反动分子毕可旦的罪恶和对其开除党籍的报告”。文中不仅列举了毕可旦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种种“罪行”，还新增了一条“惨无人道，杀害全家”的罪状。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残害了唐河人民，又残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完全丧失了人性，是地主阶级向人民实行绝望性摧残报复的代表人物……据此，县委决定，开除毕可旦党籍，特报请地委批准”。两天后，南阳地委即批准了此报告，这个5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党内一号人物，参加革命和入党20多年的革命干部，不仅被贬称为“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混入革命内部的异己分子”，还被戴上了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关于毕可旦的为人，唐河不少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口碑并不错。2010年5月27日下午，现年87岁的杜如楼（当时是唐河一中校长兼支部书记）对我讲：“我对毕印象很好。他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经济、生活作风方面都没有闲话。毕可旦从省里调唐河县委并担任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在县委小伙上吃饭，而是与家人一起整天吃粗茶淡饭，在带头不搞特殊化方面唐河县是人所共知的。1959年冬，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向县委报喜，说反出了几十万斤‘瞒产粮’，当时人

们都奔走相告，宣传着此事，我也信以为真，于是就到县委找毕可旦请示。我说，毕书记，听说城关公社反出了那么多粮食，竟弄出了一个地下黑仓库。如果确有此事的话，我想带着一中的学生们参观一下，不知道允许不允许？毕可旦笑着回答我说，‘哪有此事？什么地下黑仓库？是他们借的国库粮冒充瞒产粮，现在我正让人追查处理此事哩！’从这件事上我认为毕还是有点实事求是精神和冷静态度的。至于唐河那年饿死人多的问题，毕可旦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左’倾蛮干的大气候，毕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杜老先生说的是知情者冷静反思后客观公正的看法。

毕可旦为什么自杀，而且还要他的家人及儿女们与自己一起走这条绝路？1980年7月12日，南阳地委向河南省纪委呈送的“关于对毕可旦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中说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地委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毕可旦同志思想压力很大，一时想不开走向了绝路。”这一说法，仅道出了诸多原因之一点点，实际不那么简单和直观。

近年来，笔者通过仔细研究毕可旦自杀前写给南阳地委第一书记林晓的绝笔信，毕夫人刘桂香和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调阅与毕可旦相关的有关文件、材料，采访了解此事件全过程的当事人，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客观地说，毕可旦就是一位“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在县委第一书记这个类似“小皇帝”的位置上，抓起各项工作来虽都是雷厉风行的，可也都是“左”的。1960年11月26日和1961年元月5日南阳地委驻唐河工作组先后两次写给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的“关于唐河县整风会议情况”的“简报”，虽然有把所有问题都一

股脑儿推到毕可旦一人身上之嫌疑,但也多多少少看出毕可旦春风得意之时,“左”得发狂和出奇的程度。“简报”中说,1959年秋,唐河县粮食每亩单产仅为182斤,全县秋作物总产仅29,838万斤。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为了体现唐河县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特别是突出表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的“大好形势”和“丰硕成果”,对下面按实际产量上报的人一律严加训斥,责令重新上报。1959年9月2日,毕可旦在本县召开的各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批评说:“现在有人初步打算把15万亩高粱仅按平均亩产120斤上报,这很不像话。我们现在掌握了许多典型地块,都在500-800斤之间,要克服粮食问题上的右倾情绪!”同年11月初,毕可旦到上屯公社张清寨大队检查工作时,对该大队干部向他汇报的高粱亩产可达到240斤(实际已是扩大一倍的数字)很不满意。他在张清寨公社代表会上说:“高粱亩产240斤的说法不实。我的看法,张清寨最多可达320斤,最少也有300斤。”说完此话后,毕问一个包产队长,这个队长领会他的意思,见风使舵说:“我们队有两块好高粱亩产可达到350斤。”结果该大队高粱全按每亩300斤定产,按此测算全大队总产量即可达50多万斤,除能安排好生活外,还可售余粮22万斤(实际仅有余粮6万斤)。1959年11月20日,毕可旦在县委“关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工作纲要(草案)”中说:“今年在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党领导群众苦战了70多天,彻底征服了自然灾害,取得了高产社更高产,低产社粮加翻的特大丰收。预计全县粮食产量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产33.3%,棉花增产38.8%,油料增产89.7%,出现了不少高额丰产方和高额卫星田,狠狠地批判了‘低产论’和‘稀植论’者。”1959年12月3日,毕可旦在“县委1959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通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促进了秋季的抗旱保苗运动……今年全县秋季粮食产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亩净增产68.3斤,总产63,696万斤。”硬是多报33,858万斤“跃进粮”。

1959年9月20日,唐河县委检查组向县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反映“城关公社朱庄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群众生活安排不下来,20个食

堂现在就都不能保证每人每天平均吃到1斤原粮。王冲食堂243口人,从9月3日至18日半月内,全食堂只吃粮食111斤,每人每天平均只吃4.3两粮食(当时是16两秤,只相当于2两多)。由于缺粮,又没有其它干菜,全队主要靠红薯叶维持生计。”对于这个关乎许多人生计的“报告”,毕可旦不仅不予重视,反而把它当做了“装穷叫苦”的反面典型大批特批。1959年10月21日,毕可旦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今年夏季唐河小麦丰收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两三个月的抗旱保苗,秋粮也增产了,总产可达6亿多斤,为什么现在却有人闹粮食?这主要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有些同志说,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说完成了任务,就是执行了政策!”1959年11月初,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好多事实证明,当前否定大跃进、大丰收的,不是贫农、下中农,而是部分领导干部,本来验收的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他不去分析。有人给县委汇报有两面性,专门汇报问题,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种汇报思想本身就是想用这种材料否定县委对大丰收的结论。现在看来,党内肯定大丰收,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所以,这次会议,仍然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指导思想,应该是上一次县委三级干部(即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的继续。当前,这个问题不解决,粮、棉、油征购工作就上不去,就不能搞大跃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河屯公社、城关公社、祁仪公社都把麦种和国库粮食拿出来充当“反瞒产反出来的粮食”来展览,先后报出了反出400万斤、64.3万斤和160万斤的“反瞒产成绩”。搞了几个假经验、假现场会和逼粮会,把全县的反右倾、反瞒产、保证购推向了高潮。县委调查报告说:“城关公社常桥大队减产50%”,毕可旦闻讯即大发雷霆:“这是否认大丰收,是立场问题!”为了完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购任务,毕可旦提出:“拼命干,死了算”,“要发高烧到40度,就是烂掉一批干部,也要确保任务的完成。”毕可旦常说:“在粮食问题上,阶级斗争尖锐极啦!”1959年10月29日,毕可旦在全县粮棉油入库电话会议上说:“在唐河大寺(县大会场)搞了半个月,回去后还翻案,可见有些人资本主

义思想是很严重的……粮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资本主义当道。对资本主义一定要打倒,打倒后还要再踹上几脚,同时还要狠狠打击富裕中农思想。”唐河县书记处书记张书楷在秋粮征购入库的电话会上说:“认真发动群众,大反右倾,大反瞒产,确保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毕可旦补充一句说:“必须完成征购任务,这是对农民的一次改造!”县福利办公室干部钮丹给他反映说:“上屯公社大郭庄大队因粮、棉、油入库死了人!”毕可旦说:“真要是因为粮棉油入库死了人,也没啥!”指示属下给上屯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不要怕”。1959年11月27日,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征购问题:“公社党委中有人动摇了,认为完不成任务。或者嘴硬心软,工作上不去。大队、包产队主要是个人主义,这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在征购问题上,就是要先下手为强……社党委下不了手拿东西,是不是怕对不起农民,干劲不足了?”1959年11月29日,毕可旦在桐寨铺征购现场会议上说:“粮食征购属于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范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不彻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毕竟还是吃阶级斗争的饭嘛!”这期间,毕可旦还几次开会布置,叫找出几个粮、棉、油任务完不成的“挡道人”,指示向“挡道人”开刀。毕可旦说:“运动起来了(指粮油征购运动),一定不能挡道,真正挡道的叫干部们揍两下,也没啥!”在毕可旦身先士卒影响下,县、公社主要领导不择手段地狠抓粮棉油入库任务的完成。主抓农业

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在农业、财贸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1959年仍然是个特大丰收年,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物质基础。现在征购任务完成的迟缓,主要是因为现在公社干部中有人动摇,大队干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这是阶级斗争在粮、棉、油问题上的反映。县委研究已定,任务少一点也不行!滑、推都拖不过去。不管哪个队,哪个人,哪个社谁完不成任务都不行。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过不了这一关,非处理不行!跑了的回来也要斗争,要开除党籍!”同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介绍了城关公社有人在棉被里装了24斤棉花,一个棉裤里装了8斤棉花,各公社第一书记也介绍了各自发现的类似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典型”怎样处理?几天之后,有了鲜明的态度,李华亭主持召开了棉花征购工作电话会,下边请示说,棉花都装成被子、棉衣棉裤了,怎么办?李当即表态说:“装上也要扒出来!”从而唐河全县上下开始扒掉群众的棉被、棉衣、棉裤里边的棉花,拿出来充当当年棉花任务的疯狂行为。毕可旦常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县委委员、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更进一层发展为:“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又说:“心不狠不能治国,手不狠不能治事,面软不能立事。”郭滩公社第一书记在强调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的会上说:“完不成任务我非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砸你们的骨头不中!”大河屯公

社党委书记薛云瑞更在会上恶狠狠地说:“完不成任务者,给我照死处整!”“左”祸猛于虎也。所以,笔者认为,后来唐河县之所以在大饥荒的1960年春饿死了9万多人(1990年唐河县志测算),毕可旦等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的。

但从大的和根本方面来说,我认为,首先还应归罪于搞乱思想的三次“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其次是地委的带头蛮干。其三是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和“吃食堂”等管理和生活体制。其四才是下边的胡整乱来。从1957年7月开始到1958年4月结束的“反右



今日唐河

派”斗争,南阳专区有 14807 名敢于仗义执言、说实话的人被打成“右派”或“中右”分子(仅右派就 8854 名);接着开展的“批判潘杨王运动”,又有 9249 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 万多平民百姓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 年元月 30 日批潘运动总结报告统计表 18);1959 年 10 月开始的“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中,又有 1056 名党员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右倾错误的人”(1959 年 10 月 28 日南阳地委给省委的报告)。三次“大反右”把南阳有胆有识的人批整殆尽,在政治领域内从上到下形成了“左”比“右”好的认识误区。如南阳地委在“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就突出地批判了在粮食产量问题上讲“实”,就是求“低”,就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思想。尤其批判了在征购工作中强调实际困难,不想方设法予以完成的“右倾情绪”。“批彭”的地委扩大会议上第一遭批判的是副专员朱晓山,仅仅因为 1958 年底在推荐唐河县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莲是否晋京展览问题上他和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发生了分歧。朱晓山认为牛桂莲报称的亩产皮棉 4000 斤的棉花产量不可信,不能晋京搞展览。林晓认为真实可信,在郑州搞了一阵子展览后又强行推荐到京里进行展览,这次借“批彭”运动中又为此把朱晓山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专区计委副主任刘文祥在毛集铁矿蹲点指挥“大办钢铁”时,下边给他汇报说:“今日放出了日产生铁一万吨的大卫星”,刘文祥奚落说:“甭说一天炼一万吨铁,就是搞一万吨铁矿石也不可能”,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粮棉油征购工作中,面对着 1959 年秋因干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普遍减产一半的严酷现实,为彰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后的“伟大成绩”,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在全区秋粮任务已经超额 10%的情况下,又主动提出“再增加 1000 万斤”,使秋粮入库硬是比“大丰收的 1958 年秋季还多出 200 万斤”(1959 年 10 月 28 日地委常委会议记录)。在地委召开的粮棉油入库会议上,专员宋绍良、财贸部长宋子明大批“右倾”思想,还突出地点到了唐河、邓县两县棉油入库仅完成 70%,暗示他们可以采取“非正常手段确保任务的完成。”可见,无论是谎报产量,还是

征购透底,还是干部违法乱纪都不仅仅是毕可旦的恶作剧。从南阳来说,根源于地委及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错在“反右”,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出现的变本加厉的“左倾”蛮干思潮。

然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后,南阳地委主要领导人上行下效,摇身一变,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南阳各地普遍大量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县以下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他们把 4.8 万个基层干部视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作为“钉子”统统予以“拔掉”,把其中的 25143 人抓进监狱(南阳地委 1961 年元月 7 日的报告),县以下基层干部被斗、被整的人数一度高达 50%以上。1960 年 11 月 18 日,在两天的南阳地委扩大会议后,毕可旦即被免去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宣布他停止工作,反省交代问题。据 1980 年后担任唐河县委书记多年的惠国庆讲,1960 年 11 月 20 日,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宏作为地委工作组组长和新来的县委第一书记安成美,住进了唐河县委招待所。毕可旦出于礼节和有许多工作方面的事也需要给他们交接的需要,专程到招待所看望他们。由于董宏知道省、地委已把毕可旦当做“坏人”和“敌人”,坚决要与其“划清界线”,竟谎称明日本人去桐柏县抓运动,无暇接见。不仅如此,还放出话来,说安书记今晚要准备明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也没空闲与他谈话,这让特别讲求颜面的毕可旦很伤自尊。第二天县委扩大会议开始时,董宏却端坐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而且会议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毕可旦,这使毕可旦更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11 月 21 日、22 日两天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有人非采取压制的办法不可,这就使有些问题不具体化,我也难服气。”(毕的绝笔信)会上,不管是不是毕的问题全部都算到毕的头上,更让参加革命 20 多年一路顺风的毕可旦很难以承受。“说我歪曲政策,这个事情确实有,但最好能具体一些。还有人说我发明辩论等,其实是抄别处的。二月份中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未在县里具体抓一些事,而现在一些人却提出给我汇报的时间、次数(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把给别人汇报的,也说成给我汇报的”;“我的错误确实严重,死人,死牲畜是事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承认的。我的错误一部分是执行性的错误,一部分是我个人胡创而犯错

误,这也是事实。现在看来,要全面地弄清楚,最好县委常委的同志能够把前段的电话会议记录稿多看几份,不管是地委的县委的都行。如粮棉油入库问题,孙书记(孙电如,地委第一副书记)把我叫去日嘍过几次(即训斥)”;“去年10月贯彻庐山会议期间,孙电如书记一直参加唐河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发现有干部违法乱纪问题时,我即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前毕店公社第一书记李树森同志。可是就在这个会议的前几个钟头,城关公社书记宋德福在斗争一个叫刘丰岩的公社书记时,当着孙书记的面宋就推搡了他几下。孙书记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表扬宋德福斗争人‘有办法’,还说宋德福咱们坐下来谈谈,说积极分子恼了对有的人推搡几下可以理解等。当然我决不是推诿前段工作中的错误,而是把情况摆清楚,可以深一层考虑一下。”以上几段话都出自毕可旦11月22日给林晓写的“绝笔信”。从这些绝笔信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在董宏主持和怂恿下,唐河县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把什么问题都算到毕可旦身上的极端过火行为,这些做法,对毕可旦被迫走向绝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毕夫人刘桂香的“绝笔信”中也透露出了毕可旦之所以自杀的一些诱因。“俺孩子他爹说,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原唐河县委宣传部长齐光禄被毕可旦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后,有违法乱纪问题,“齐书记违法乱纪严重,不该提拔的提了,他有几条人命,咱可担待不起!”;“前些时,俺在郑州上学的大儿子剑鸣回来说:‘爸爸跳到火炕里了,上海饿死了三个人,法办了十几个领导干部’。我在青岛工作的一个弟弟来信说:‘姐夫这个工作危险哪,责任大。’”刘桂香的“绝笔信”中还说:“现在有人说唐河县饿死人没人上报,都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人家怕,咱更怕!”这些也道出了毕自杀的部分原因。毕可旦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中还有这样的话:“今年我父工作中出了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觉得万分惭愧,所以自杀”;当时盛传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的要对出了大问题的地方主要负责人“杀一批,关一批,判一批”的紧张风声,对毕可旦压力很大。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已经被抓,鄢陵县委第一书记

已经开枪自杀……这些更使毕可旦如坐针毡。所以,毕在给林晓的“绝笔信”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简单地说,我嗅到了一个气味,暗示性的语调,即要把我的问题当成敌人性质的问题处理。这样我就考虑了,思想上确实开展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把这两天在地委参加会议所听、所记的笔记翻阅了几遍。你的报告中也提到南阳有几个县的问题在全国也能算上坏典型……李富春副总理就是这样讲的。镇静与震惊相比之后,我考虑,唐河既然是全国有名的问题县,列为震惊那是肯定的。不要等大张旗鼓地处理吧?从现在看,不严肃处理几个有的人也不会同意。”“与其等组织处理,不如自己了断自己”。

综上所述,我把毕可旦自杀的原因归纳如下:身为主政唐河多年的“父母官”,毕可旦对唐河县后来查出饿死那么多的人感到无颜再见唐河人民,也为自己一定要为此承担的重大责任而后怕;县委扩大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现实,不顾事实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而又不给解释的机会,使他感到很冤枉又很憋屈;省、地委要把他当“敌人”处理的极端作法,外地不少地、县有问题的领导人已经被抓或自杀的残酷现实,使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爱人刘桂香家庭妇女,身体又太坏,觉得再活下去,抚养儿女也将成为大问题,决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爱人死后4个儿女无人抚养,“将会成为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今后的日子很不好过,生不如死……所以他就选择了和家人6口一起自杀的绝路。而在这些诸多理由中,我认为主要还由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以“左”反“左”,谄过于下,对犯错误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近人情的极端做法。“左”祸害人也害己,这就是毕可旦事件给人的惨痛教训。毕可旦自杀几天之后,唐河县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罗保全从唐河大桥上跳入唐河水中溺水身亡,邓县文渠公社第一书记郑德恒和镇平贾宋公社第一书记朱保仁等也先后自杀身亡。可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以“左”反“左”酿成的人命案在南阳并不是个别现象。

(作者为《南阳日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农业科学中的权力灾难

● 辛 北

最近阅读了上世纪 50 年代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李开鼎的纪实文章“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李开鼎, 2003, 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 <http://www.econ-stage.net.cn>), 令我浮想联翩。我曾在北京农大学习、工作 30 年, 回想那些年代不断发生的权力学术灾难, 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苏联和我国遗传学的遭遇, 许多作者已有论及, 经过事实大体已经昭示于天下。这里我谨就自己所见所闻, 加以补充分析。

权力干预学术的近代“中世纪”

苏联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 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后来, 我国在“一边倒”的国策下沿着“老大哥”那条邪路走了很长一段, 给我国的农业科学和生物学, 乃至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害。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是推行可谓纯粹的“‘社’学为体, ‘社’学为用”, 鄙夷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凡敢于赞扬姓“资”的科技者, 皆会被视为异端和不忠。譬如, 苏联国内偶尔也会翻译少量国外科技书籍, 但编译者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前言或后语中附上一句“本书的缺点是没有(或很少)收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资料”, 以宣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不忘“贬损”西方。中国到了七十年代则几乎都要在卷首引用一些“批判吸收”、“洋为中用”等“最高指示”以避“崇洋媚外”之嫌, 充分说明科技工作者无时不生活在一种“恐惧感”之中。

前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展过对诸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宇宙论等学说的批判, 其中传统

遗传学(即所谓“摩尔根遗传学”)被诬称为“旧遗传学”、“反动遗传学”, 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1949 年以后, 我国紧步苏联后尘, 剿灭被指称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学说, 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打压、剿灭“摩尔根遗传学”。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要剿灭国际公认的这一个传统自然科学学科呢? 这方面方舟子有所论述, 他说: “从 1928 年起, 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迫切地需要……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先进的……遗传学。……于是……米丘林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

斯大林不仅要充当“哲学王”, 而且要“统率”和“指导”自然科学。

李森科是苏联体制下攀附权势的所谓“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 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 精心组织对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院士的围攻, 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无限拔高成一场阶级斗争。

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同时以教条主义的“哲学推理”代替科学实验, 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这种歪风邪气在苏联和中国历来是屡见不鲜的。

在上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幼嫩的遗传学难免包含有争议的哲学内涵(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 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实验和仪器揭示复杂的生命现象并做出结论), 而斯大林本人早在 1906 年就向往着所谓“新拉马克主义”, 认为它符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 正中斯大林企图

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早就说过:“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改造自然。”而他所指的社会科学不外乎就是马列主义及其哲学。

李森科的中国追随者

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指导下,于1948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包括笔者个人),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李森科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崛起”,而其在中国的最热烈追随者则是乐天宇。1921年,乐天宇曾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来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读书,1939年赴延安,1941年初以延安“中国农学会”的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秋迁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

之后,乐天宇及其追随者,即所谓“米丘林学派”,立即向传统遗传学发动进攻。他们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政治与行政权力,借助于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当局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乐天宇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在极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京农大一位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那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北京农大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引起了中南海最高层的注意,乐天宇本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于1951年3月调离北京农大。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说过乐天宇企图占据学术“霸主地位”。这种“定性”有意无意地遮盖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署名文章也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而实质上却无条件

肯定了乐天宇原来所致力斗争方向,并再次宣布米丘林生物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自觉地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这篇文章肯定了米丘林学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哲学基础;对传统遗传学仍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甚至“法西斯主义的”(乐天宇还没用过这个词汇),认为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须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要继续系统地批判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不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学改造遗传学,还要以此彻底改造中国生物学各个部门。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乐天宇完全是政治正确的。

乐天宇本人当然也有“学阀作风”,但只有在盛行“一边倒”和“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才会如此疯狂滋长。只是这株“恶苗”一时“疯长”得太过分,达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反而打乱了最高当局稳扎稳打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抢夺教育和学术领导权的战略部署,造成了相当被动的舆论和人心向背的局面。于是这棵“恶苗”才被最高当局“果断”地“间掉”了。

乐天宇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老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他自认为肩负着改造旧大学和领导一场生物学革命的重任。乐天宇1949年9月带领华北大学师生来京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并入的还有清华、北大农学院)之前就动员师生说:“此次我们去并校,任务就是要去改造那些资产阶级旧大学和师生”,从而挑动了与北大、清华农学院师生的不和。

气候没有改变,恶苗仍会生长

是不是“后乐天宇时期”一切都平顺了呢?没有。在1952年如火如荼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许多教授仍因学术观点与官方路线相抵触而被当作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问题严厉批判,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了。

生物科学界的又一事件是1955年在北京农大召开的“声讨”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大会。那是地地道道官方旨意的显现。胡先骕不但被大会“声讨”和遭受漫骂,而且被阻止进入学部委员

的班子(那时的学部委员是指定的),著作也遭全部销毁。1957年,胡先骕成了不带“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但对他斗争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李景均在乐天宇当政时期的不幸遭遇。那时候的李景均只不过是乐天宇的悍然、粗暴的干预和“围困”,而被禁止继续讲授《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等三门课程。李景均出走到美国之后成了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世界级的数理遗传学家,担任过“美国人遗传学会(ASHG)的主席”。

1956年8月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表面上似乎给摩尔根遗传学派开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仍被当作迟早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的对象。传统遗传学之所以一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那是因为他急于凸显“百家争鸣”之政策。但是接着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把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更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左派”学者得以重振士气,掀起对传统遗传学又一轮进攻。1957年间在官方的报上出现了一些由知名“左派”学者发表的“檄文”,如《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北京农大有些年青教师,整风时“放”出了一些言论,批评来华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思想构成了“左”倾冒进的理论依据。除了某些明哲保身和善于顺应潮流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味良心的捧场话语之外,不肯顺从的专家学者都遭受无理批判,轻者被斥为“思想保守”、“不如农民”的“大草包”,如北京农大的育种学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重者则被当作“白旗”拔掉(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批判)。

较具所谓“学术色彩”交锋的还是那时果树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之争。疏花疏果是果树生产上早已通行的矫治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术和理论,从形式上当然和“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相抵触,于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而“保花保果”(实际上应称为“不许疏花疏果论”),则被授予了“无产阶级”的桂冠。

农业经济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政治批判的

恶浪特别汹涌。北京农大召开全校大会批判著名的应廉耕教授是美国农经专家卜凯的“忠实门徒”,是“以卜凯思想为灵魂的反动集团”的“首脑”。应廉耕被撤销系主任职务,他和该校党委委员张仲威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政治甄别时才予平反,承认扣那种政治帽子是错误的。

又一条政治鞭子

这里不能不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批判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不知反反复复地掀起过多少风波!那时“欧美”被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同义语,而“苏联”则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同义语。平心而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会有这一对矛盾。比如,美、澳的农民就常对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的教授颇有微词,原因是理论研究不可能马上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不过那是农民从他们的实用角度误解了科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组织过教授“宣讲团”(按我们的“习惯语”),向专业农户介绍他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路线。这没有什么奇怪。

乐天宇入主北京农大之后便很快煽起一股“转系风”。他把“农学”、“园艺”、“畜牧”、“兽医”、“农机”、“林学”等归为所谓“生产系”,而把“植保”、“土化”等打入所谓“非生产系”的另册,下令党团员带头从“非生产系”转读“生产系”,从而引起全校大混乱。

“大跃进”年代,报上连篇累牍片面地宣传所谓“高产样板田”,把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田间控因试验法”斥之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研究,是“精神贵族”的游戏,并以此对“资产阶级权威”开展大批判。这种胡乱贴政治标签,不讲科学方法的愚昧加野蛮,成了“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高产田”神话的导因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一个正确原则,但当年乐天宇别出心裁地提出“生产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口号,从而混淆了三者的界线,成为他以劳动生产代替科学研究的口实。总结农民经验作为开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固有其价值,但总停留在“老农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

错误。这种错误观念如幽灵般地影响了我们几十年,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1958年大跃进,大学里提出“不要迷信权威”,大肆批判、贬斥教授,咒骂他们是“大草包”、“崇洋媚外”。发动学生开大会批判教师的讲稿,组织学生大编所谓“教材”(实为农民经验的抄录配上“八字宪法”的演绎)。有些农学院批判“在课堂里学种地”是脱离实际,于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田头教学”,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里讲课以示边劳动边教学的无产阶级教育模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农大的一任校长,部队首长出身的陈漫远仿照“农业八字宪法”的风格,独创了所谓“教学六字方针”——“做、听、读、议、总、写”(即师生一起下放劳动教学,按照“劳动、听老农讲课、读书、学生班上开会讨论、班上搞阶段总结、师生一起编写新教材”的顺序完成整套“边劳动边教学”过程)。在科研上,则提出“从生产出发,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紧跟”的教师曾主张,当前生产上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研究什么问题,并对主张进行较长远科研规划的教师一概斥之为“脱离当前生产”。陈漫远还对科研工作独创了“计(划)、试(验)、观(察)、(成)果、总(结)”的“五字方针”,犹如厨房里需要有“油、盐、酱、醋、茶”那样的大实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可笑。但那时“脱离实际”、“不向农民学习”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成了随时可以抽打知识分子的政治鞭子。陈漫远的口号和乐天宇的口号完全一脉相承,都是贬低前人积累的知识,尤其是他们指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积累的大量知识。他们提倡一切都必须是在当时的生产中学,当时的生产中教,当时的生产中研究,否则就是脱离实际。乐天宇就说过:“农场就是实验室,

大自然就是课堂”,“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是唯心论”。

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一个大学的“第一把手”换了,不管谁来都一样会搞极左,关键问题是整个政策和政治环境和风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健康改变。

“理论脱离实际”这把政治鞭子,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编造的“学农化的不懂施肥”、“马尾巴的功能”(讽刺所谓课堂上讲无用知识)。那时,北京农大批判周大诚(副教授兼党委委员)的猪代谢生理研究是“搞猪公馆”(他为了方便搜集粪便化验而在猪栏里铺设了水磨石地板);批判张鹤宇教授的“鸭子耳朵研究”脱离实际(后来据说该项仿生学成果受到海军的青睐)。

其实这种“政治鞭子”的最大者莫过于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发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它导致了全国农业院校的大搬迁、大破坏和农业科学大倒退以及广大师生的大遭殃。而所谓“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种空泛的“大实话”口号常常成了对生产瞎指挥的“理论”依据。

(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开拓文库”系列丛书(总第2辑)征稿启事(文史类)

“社科文献论丛”系列丛书(总第26辑)征稿启事(社科人文类)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学术专著的社会化利用,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开拓文库”系列丛书目前正在组稿中,“社科文献论丛”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25辑,共计250余部图书。这两套选题(丛书)新的一期图书正在组稿中,相关事宜如下:

一、书稿要求: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够较好反映目前社会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具有时效性,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

二、征稿范围:书稿主要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历史与年鉴等论著,以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论文集等为主。

三、其它事宜: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出版合同;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回复;3、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更佳,请注明联系人、地址、电话;4、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另需要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书画作品,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等题材书稿,欢迎您赐稿!

投稿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南里长城国际B6单元705信箱(101121)

国际文化艺术编辑中心(收)

咨询热线:010-58438169 52995426 传真:010-52995426

在线投稿:bookcb@163.com

联系人:王老师、姚老师

网址:www.bookyswh.com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 张持坚

不到一月，三次吹风

1986年夏天，阅读党报党刊的人们会感觉到，有一股呼唤新闻改革的清风扑面而来——8月14日新华社播发通稿，题目是“‘报纸会议消息多而枯燥，我们不爱看’读者的意见引起报纸总编辑们的关注”。《人民日报》15日在头版刊登，全国各省市的党委机关报也都刊于醒目位置。稿件在列举了一些报纸统计的平均每月会议消息少则四五十条，多则七八十条的情况后，写道：“有些会议读者很关心，会议精神对面上工作也有普遍指导意义，报纸应该发消息。可是，有相当多的部门召开的会议，是纯业务性的，发了消息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主管部门总是说：‘发个消息吧，登报了，说明我们干工作了嘛！’”稿件接着写道：读者对此所以不满意，因为他们看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宣部副部长腾藤认为读者意见有道理。他说，报上消息多而枯燥的现象非改不可；要改，各级党委要支持，报社自身也要努力，对重要的会议，报社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要精心写作，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做按新闻规律办报。

隔了3天，8月19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发消息——为引人关注，做了三行标题，眉题是：总编辑们深感报纸宣传不适应形势；主题是：办好报纸希望在于新闻改革；副题是：增加信息量，扩大报道面，鼓舞读者投身改革洪流。第二天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全国三十几位省市报社总编辑普遍对自己的报纸不够满意，感到与宣传改革、开放的形势还不适应，大家把办好报纸的希望寄予新闻改革。

20天后，9月8日出版的、由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用两页篇幅刊发了“适应改革需要新闻必须改革”的文章。

接二连三的信息，不仅在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在其他行业和社会上也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信息，均来自哈尔滨松花江畔友谊宫宾馆的一间会议室，中宣部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作为采访这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这些信息都是我发出的。

这次会议是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意召开的。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推进，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又连续提出意见，作为促进改革重要力量的党报怎样进一步发挥作用，成了高层关注的议题，同样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回答的课题。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央和省市党报的总编辑们没在一起开过会。这些都是敏锐之人，其中不乏老资格的新闻界前辈，如《文汇报》老总马达、《人民日报》副总陆超祺等，对于形势和责任他们了然于胸，因此对此时此刻中宣部的召集，都格外珍视，也深感责任之重，个个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议论风生。

对成绩，总编辑们同意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归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可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然而，他们更多的是“不满意”，新闻改革必须深入下去。

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也要改善

党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何按照新闻工作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用行政手段来领导，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议论的首要问题。他们认为，党毫无疑问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领导、科学地领导。

解放日报老总说，党对新闻的领导，实质上关

系到党和国家的新闻政策是什么,党的新闻体制、结构、布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进展不大。原因一是有禁区,涉及敏感问题不少,有些问题难度很大;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可现在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许多问题仍扯不清;三是新闻改革不是独立的,涉及民主生活、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同时,感到新闻改革有紧迫性。长期以来党委对报纸的考虑基本上是政治需要和工作需要,而不太考虑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报纸主要功能是什么?一种认为是党的宣传工具,一种认为首先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一个实体。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报纸首要还是传播新闻。举个例子,国际上的重要事情国外报纸都在头版突出报、连续报,而我们不仅上不了头版,报的也很简单,上头版的往往是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相比国际上的重要新闻和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读者对哪个更感兴趣呢?答案是不用说的。可为什么读者感兴趣的新闻上不了主要版面呢?这样办报符合新闻规律吗?

《黑龙江日报》老总认为,上级党委在领导党报的过程中,行政意识和政治意识过强,而文化意识过弱。党报有政治属性,但作为报纸又有其文化属性,在重视政治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属性。同时,现在是改革年代,如何领导好党报还应有改革意识,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以形成比较开放的传播信息的格局,使舆论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辽宁日报》老总的看法是,新闻工作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办报人自己思想很紧,整天提心吊胆,怕捅娄子、怕犯纪律,怎么能宣传和创造生动活泼的局面呢?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办报是风险最大的,这可不行。同时,要允许办报的人犯错误,允许有失误,他们不是神仙,应该相信新闻工作者,上面若给报社宽松的环境,报社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会更慎重地把好关。

《文汇报》老总指出,对新闻统得过多、过死,一定要改。比如人民币贬值不能报,结果造成群众逆反心理,贬值登出来有什么不好?无“疏”又何来“导”呢?他还说,对报社干涉多,哪个部门都来指责报社,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与会人员还对“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进行了探讨。因为从理论上讲它们是一致的,可实际上

要做到一致不容易,往往重“党”而轻“民”,甚至还有好多“民”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报纸上来自上面的声音多,来自群众、基层和专家的声音少;统一的声音多,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和流派的声音少,讨论和争论的声音更少;自上而下灌输多,自下而上的反馈和意见少。《新华日报》老总说,要讲真话,把事实告诉群众,也要让群众说话,否则掩盖矛盾,搞愚民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规律。

批评报道少、批评报道难,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老总们分析说,批评报道难,主要难在上头。有的领导怕批评报道影响安定团结;有的领导认为批评了他分管的工作,是在他的脸上抹黑;有的领导觉得有问题在内部讲,不要弄到报纸上去“扩大”负面影响等等。《吉林日报》老总回顾说,报纸发表批评报道后总会受到批评,而没有受到过表扬。实际上报纸批评很有用,群众反映很好,对改进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委之所以对新闻管得多、管得细,规定“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这个这样报,那个那样报”,主要是觉得新闻敏感,影响面广,怕捅娄子。总编辑们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确实捅过娄子,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但是靠上头“管住”、“管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让报纸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少捅娄子,不捅大的娄子。当然,对“娄子”也要持辩证的观点,不能有点什么事就说捅了“大娄子”,要相信读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有的“娄子”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陈旧的观念看是“娄子”,用改革开放的意识看,很可能是创新探索之举。总之,党对报纸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向性的领导,而不是管具体的事,该由总编辑做的事要让总编辑去做。

解开自我束缚的绳索

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战线如何“自我解放”,从习以为常的束缚自己手脚的做法里摆脱出来。当然之所以会“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新闻界的打击和影响有关,和上面管得过严、过细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和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有关,和没能紧紧地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关。大家的共

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新闻界自我解放的潜力很大,空间广阔;新闻界在要求党和政府按新闻规律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同时,自身首先要按新闻规律办好报纸。

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从抓新闻入手。没有新闻,或没有吸引读者关注的新闻,版面上基本都是工作和业务性的信息——这几成党报的惯例,也是读者对报纸最不喜欢的地方。《人民日报》老总带到会上一份调查,通过对1978年12月到1981年4月刊发的8000多条经济新闻的分析,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只占4.3%;读者对《人民日报》的反映是,评论有人看,批评报道有人看,国际新闻有人看,其他则少有人问津。他还评说,新华社虽然每天发稿很多,但能被报纸选用的不多,因为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少,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更少,大量的既无新闻价值又无宣传价值。

抓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很强,可好几位老总都抱怨说,我们的新闻经常是“马后炮”,甚至“比马后炮还马后炮”,好像新闻晚几天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更有一种看法,认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不要学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远不如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怪事也时有发生,国内的事海外报纸先报道,我们再见报。

加强解析性报道。《文汇报》老总说,我们有个毛病,上面讲一句话,传达到下面还是这一句话,报纸做得也不好,不作内涵分析,即使分析也很有限,这怎么行?表面看,“原原本本”传达好像是最负责任,实质上是当传声筒,没做事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报纸是面向大众的,有释疑解惑的功能,读者也有这个需求。当然,不作解析也有怕说不好,怕承担责任的顾虑。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职业素养和工作水准;同时也要有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敢于去做;还要认识到解析报道不是“一次性”的,要连续做,以逐步修正、深化和完善。

要敢于创新。《沈阳日报》老总说,今年开人代会,就找出去年的报纸版面来对,照猫画虎,觉得这样稳当,不易出事,类似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不改怎么得了!时事在变,而你“以不变应万变”,那新闻的“新”在哪里,新闻和报纸的生命力在哪里?

增加信息量。一些老总说,这些年涌现出了一些小报、包括大报的周末版受到读者欢迎,分析

“小报热,大报冷”的原因,主要是小报信息丰富,有看头。但也有一些党报工作人员看不起小报,认为小报的信息档次不高,缺少政治价值、宣传价值。对此,《南方日报》老总形象地说,党报改革要放下架子,“脱下中山装”,真正把读者放在心里,把自己摆在读者之中,向读者传播他们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对报纸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提高阅读率,否则依然是“官办,官订,官看”,群众不爱看党报的现象仍难改变。

继续清除“假、大、空”对新闻界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在探索、发展和变化之中,新闻报道务要与之相适应,坚持实事求是,切忌“求全”,切忌把话说满、说死。

“解铃还需系铃人”。新闻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要将改革引向深入,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重要的基础。总编辑们表示,要强化“自我解放”、“从自我做起”的理念,喊响这个口号。

读报观念也要更新

“更新读报观念,不要把党报的报道都认为是党的声音”——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读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报纸上的文章都是传达党的指示的,因此要学要用,要当做思想指南和行动依据。总编辑们认为,这种读报观念不更新,也会束缚新闻工作者的手脚,制约新闻改革的开展。我们的报纸是党领导的,报上的内容总体上是根据党的指示精神采写和编排的,有的则是直接传达党的指示,但这并不表明篇文章都代表党说话,因为报纸还要反映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要求这些内容都在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也不能要求所有创造的经验都必须推广执行。办报人并非圣人,报纸每天出好几万字,登几十篇文章,不能要求一点差错都不出,更不能要求篇篇字字都反映党的声音。此外,报纸上出现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文章也要允许,不要动不动戴政治帽子,因为好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定论的,应该展开讨论和争鸣,各执一词也是正常的,读者不要觉得不好理解。报纸毕竟不是党中央文件,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质。读者如这样来看待报纸,就为报社创造了有利于

改革的宽松气氛。

审慎前行

这些长期耕耘在新闻战线的老总们，深知新闻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和政府体制改革又密切相关，涉及政治生活、民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独进”；但是，新闻改革又有紧迫性，否则对改革开放大局的推进不利。老总们决定在前些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自我思想的解放做起，从内部改革做起，从报纸的内容改进做起，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以取得上级党委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钟沛璋对大家的讨论作了提炼，提出要实现5个转变：变单向为双向，把上对下指导，与下对上监督结合起来；变单功能为全功能，既重视宣传功能，也重视报纸的其他功能；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变指令型为服务型；变灌输方式为交流方式。大家觉得切合实际，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主持座谈会的中宣部副部长腾藤，对会议成果作了积极评价。他从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上调中宣部时间不长，分管新闻。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苏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再到国家科委工作。他说，他是宣传战线的新兵，作为报纸的热心读者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介绍说，会前曾就改革怎么宣传，新闻怎么改革向启立请示。启立说，耀邦对此也很有想法。小平已连续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某些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了理论界、思想界的热闹话题。但不能刮风，不能急，急了不好，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扎扎实实往前走。新闻改革也是这样，步子要稳。

接着，他指出，新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当前，就要很好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否服务好，是衡量新闻改革搞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他说，由于新旧体制交替，改革很艰巨，对改革宣传的任务也很重，不能太急，也不能片面，许多改革措施各有利弊，宣传上简单化不行，要抓住改革的

每一步做好舆论工作，以提高群众的承受能力，新闻界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说他很赞同《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珠说的“自我解放，余地很大”这句话。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确实有把自己造成的模式当菩萨拜的现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该大胆破除旧框框，破了旧框框，新闻改革的天地就广阔了。他鼓励大家，在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违反党报性质的前提下，放手大胆去改革、去探索，各报可以比一比，看谁改得更好些。他还说，他赞成《新华日报》副总编辑金清中提出的看法，报纸上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该归编委或总编辑，报社领导有取舍新闻的权力。现在报上会议报道太多、文件报道太多，真正可读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太少。对于这种状况，不仅读者有意见，耀邦、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赞成。什么新闻可以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对于各级党委加强和改善对党报领导的问题，他推崇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省委的做法：即既关心，支持，又放手，同时加以必要的领导。

这次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的信息传开后，在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作为“当事人”，我自然很关心，隐约听到一些，心想：或许有些人觉得会上有些议论激进了、超前了？老总们的有些“诉求”“过”了？但不管怎么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新闻单位还是积极而又审慎地从自我做起进行着新闻改革，哪怕是点点滴滴——版面的调整、会议新闻写作的改进和信息量的增加……总之，在努力地往前走。

作为新闻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那次座谈会留在了史册里，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抚今追昔，二十多年前老总们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谈笑风生，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作者为《上海证券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读周有光《朝闻道集》笔记

● 于 友



耄耋学者周有光的新作《朝闻道集》，是今年他 105 岁时出版的一本文集，内容都是他近年所写有关世界文化发展史和世界发展形势的文章。他高瞻远瞩，深刻地谈论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他殷切地希望以此告诉读者世界发展的形势，从而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周老为这本文集的命名，显示着他致力于启蒙的殷切期待。

我把这本书读了几遍，很想写好这篇笔记，以利于复读，充分领会周老那些具有生命一般宝贵价值的远见卓识；我体会：它们正好是当今我们亟需理解的科学历史观。

有关这本文集的评语

《朝闻道集》最前面刊登着几位名家赞扬本书

的短文，我觉得它们十分有助于我自己对这本文集的领会，特首先把其中最精彩的评语摘录下来：

1. “周老先生的这部《朝闻道集》，是在学贯古今中外的基础上的新审视、新思考、新创造，它冲到了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前沿。”

2. “他对中外典籍、历史、文化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和资讯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站在思想的前沿，以全新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解读和诠释，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高远清新的思想窗户，看到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文化新世界，并将引导人们进一步追问和思考。”

3. “他兼有俯瞰全球的文化视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背景，语言大师的精通文字，历史老人的清明睿智，现代公民的社会关怀，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

这些评述道出了这本周著的特色和主要意义。

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

《朝闻道集》着重谈论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是指人群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本形态，它不仅包括思想意识形态，也包括经济、政治等活动多种变化的形态。就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世界各处“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朝闻道集》第 95 页，下同）。它们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轨道”。（120 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各个地区又有各自的发展特色，特色不能否定一般规律。

(97页)

人类文化就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来说,有四种传统文化,1.东亚文化;2.南亚文化;3.西亚文化;4.西欧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西亚文化合称东方文化。(93页)就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来说,还有地区文化之外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

国际现代文化以科学为主流。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可低估。(94页)

“双文化”新旧并存,相辅相成,自然消长。传统文化发扬精华,淘汰糟粕;现代文化吸收众长,青出于蓝。

不同文化相遇,可能发生三种情况:1.并力、互补;2.融合、更新;3.排斥、冲突。文化冲突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知识差距的冲突;狭义指宗教迷信的冲突。以专制对抗民主是神学文化和玄学文化同科学文化的冲突。“9·11”恐怖组织摧毁纽约世贸大楼是宗教迷信的文化冲突。(117页)

不同文化之间和谐是常态,战争是变态。如何永久和谐共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欧美提出的理念是:世界多极化,容易发生战争,世界一体化,容易和平共处。欧盟是一体化的尝试,获得重大成功。国际共同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结构,提供了长期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119页)

现在美国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文化的主要代表,它就经常受到不同文化如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攻击。

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必须有共同的交通规则。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跟世界接轨这一步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120页)

我国华夏文化的演进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从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的文字记载,经过原始的卜巫文化之后,从春秋到清末2500年中,以儒学为主轴,经历了四次演

变: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的儒佛并重,宋代和明代的理学传布。清末以前,华夏文化为历代帝王服务,当年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都曾稳步发展,并有培育五谷,养蚕缫丝,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等重大创造,造福人民,惠及邻邦。近代以前,跟西欧、西亚和南亚相比,华夏文化和东亚文化毫无逊色,或许略胜一筹。(16-17页)

华夏文化在过去多年期间,包含多种学说和宗教。儒学即孔孟学说,它以“仁”为中心思想,以“礼”为行为准则。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培养人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礼仪之邦。这学说实事求是,朴素无华。但汉代董仲舒将儒学教条化和虚无化,把人际关系纳为三纲五常,更偏向于为皇权服务。佛教从印度传来建筑术、天文学、数学、医学、语文学、因明学以及使人耳目一新的音乐、舞蹈、文学,使唐代多元文化大放光明。到宋代和明代,儒学演变为“宋明理学”,把儒家的纲常名教提高到神圣天理的玄虚程度,失去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也有阴影。老子宣扬愚民哲学,理学提倡玄学,距科学的实证精神格格不入。过去以农立国,小农生产,重农轻商,厘金盘剥,经济受封建的重重束缚,无法扩大再生产。

过去“格物致知”的思想没有发展为科学,“民本思想”也没有发展为民主。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体用分裂,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裂,这不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名为革新,实则保旧。

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换骨大手术。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

人类历史演进的轨道

《朝闻道集》里有一篇文章《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断言,“人类历史从刻符和岩画来看,有一万多年,世界各个民族都在同一条演进轨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轨道、重又回归,有道外徘徊,终于上轨。”

文章着重研讨现实阶段和理想阶段的关系问

题。这里最重要的理念是不能“以空想为现实,以落后为先进”。

文章指出:“苏联结束,档案公开,开始了苏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历史学家们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消灭地主和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这都违反历史常规,结果发生大饥荒和大清洗,自残自戕,自行消灭。”

苏联瓦解的原因也就是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还有苏联创造了“共产主义特权阶级”。

同一篇文章论述“美国何以一枝独秀”,美国发展依靠民主和科学。自然科学领先,社会科学领先。美国实行福利制度,劳资两利。

文章断言“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落,周期往复。”

中国将怎样演进?文章认为“放弃阶级斗争,走向改革开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参加世界一体化的第一步。”

文章断言: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理想和现实,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38页)

另一篇文章指出: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建设资本主义,要先达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还要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

文章还说明:“人类已经不能没有理想了,没有理想就失去精神支柱和前进方向。但是,抬头仰望理想的时候,必须低头看清楚前进的脚步,不可把理想捧上天堂,把现实贬入地狱。”(6页)

全球化一往无前,天地无阻

《朝闻道集》的重要文章之一是《全球化巡礼》。这篇文章论述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它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全球化由工业化而发育,由信息化而形成。

全球化的初步成果是:交通高速化、信息网络化、贸易世界化、生产外包化、工厂无人化(机器人工作的工厂叫无人工厂,无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股票制度产生持有股票的工人阶

级,劳资区别模糊了)、文化国际化。

二战之后产生许多国家的联合议会组织——联合国。欧洲二十多个国家产生了欧洲联盟(欧盟)。苏联瓦解后,独而又联,1991年成立“独联体”。2007年,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1951年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2002年,非洲53国成立非盟。阿拉伯国家2005年有个松散的联络机构阿拉伯国家联盟。地区联盟应当是全球化的基础组织。

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将永远在不平衡中共同前进。(72页)

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生活贡献最大。工业外包使后进国家发展了工业,扩大贸易使进出口双方大幅度增加收入,观念大变,过去反对资本侵略,现在欢迎外资来临。如今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提高了生活水平。21世纪的和平演变正在发展。

(98-99页)

几句结束语

《朝闻道集》内容近百篇文章,篇篇立论精深,需要认真领会。这篇笔记着重记下了这本书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论,我认为它们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认识它将有助于了解现实世界和我们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都只是历史研究的推论,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苏联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阶段,企图建立直接通向共产主义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搞成了封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繁荣的市场经济,失尽民心,终于全部瓦解。关于苏联的解体,《朝闻道集》有专论予以认真的分析。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发展过程,这本文集也有专论,足以辨明许多是非问题。文集还分析当今的俄罗斯正在从头建设资本主义。

可以说,《朝闻道集》确实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天地,我将把它当做反复阅读的“座右铭”。

(作者为《中国日报》前副总编,现年95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 王晶垚

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8月9日中午，我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紧急匿名唁函。

这封唁函的起草时间是1966年8月8日下午2点。信中陈述了卞仲耘遇害的全过程。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

据其他几位受害者和目击者后来揭发，卞仲耘同志被折磨、杀害的经过，比这封信里揭露的还要野蛮，残酷得多。

在当时极其险恶恐怖的血腥局势下，这封信不得不用特意改变了的笔法和字体写成。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

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信寄到我手中不久，女附中有人前来追查，凶恶地迫令我立即交出此信。我当即坚决拒绝。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中共西城区委员会印发《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的文件。

1978年8月5日，在八宝山举行的卞仲耘追悼会上，《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与这封《匿名唁函》，作为悼念文件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以告慰死难者卞仲耘同志。

44年过去了，我一直郑重保存着这封匿名唁函原件。今天，我想通过《炎黄春秋》向当年发出这封匿名唁函的师大女附中张静芬老师表达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对她的衷心感谢。

2010年8月5日

原件一、《匿名唁函》全文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我们在楼上开会没有下去）：她临终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肩膀肿得老高。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她和胡志涛、汪玉冰都挑不动（很大的筐），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肉都被一块块带下来。（胡志涛说，这是违反政策的。后来就被用绳子捆起来手。）（现胡汪都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人死不能复活。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毫无疑问，这是别有用心分子干的！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怜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实人。高血压、心脏病，病成那个样子还硬挺着挨斗。不敢说一句，这说明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申冤。

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 王炼利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

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

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首先要为老卞把事情弄清，揪出坏分子。这也是对党负责。证明她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黑帮。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她还那么小，只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夺去慈爱的妈妈。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最后，希望你一定节哀。冷静再冷静，凡事三思而后行。你是革命前辈，相信你一定处理得好。

我和你只见过几面，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

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可惜老卞没有坚持到文革的最后时刻。不过，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一定会弄清。老卞是有群众的，谁想破坏文革，一万个办不到！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

老卞在天之灵！（她为党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不忘！）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8.8.2 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黑七类”

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做“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

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代);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随时都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分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

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的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

‘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欢迎订阅2011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9058

传真：（010）68532569

每期定价：8.00元

全年定价：96.0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一部颠覆性著作： 《二十世纪俄国史》

● 李玉贞

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的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才是唯一的保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

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们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

“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林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这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务”,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

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真相,叶卡特林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页545)

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

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

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枪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荒,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

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10‰。但斯大林依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的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页901)。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难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А·Ф·Лосев)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

典型,并且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自己在集中营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者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尼瓦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

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定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国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望着俄罗斯的复兴,期望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老人出书历史见证！

二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至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家史传记、家谱族谱！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相关说明：

- 1、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 2、出版附赠光盘，需要整理文稿、专题创作或录音摄像的另行协商。
- 3、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赠送样书。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展示接待：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大街64号、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
雪芹书画社2楼大厅 邮编100080

编辑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5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106室 邮编100089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z.net)

长途免费电话

400 633 2311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图书出版代理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全国30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具有图书期刊发行资质,销售网络覆盖新华书店、卓越网、二渠道等,是一家集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一条龙服务型的正规图书出版代理结构。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出版: 音乐出版、戏曲出版、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代理发行 版权交易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版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香港出版社出版, 有正规版权页条形码与标价, 但不能在国内主渠道等发行销售。
- C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出版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 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 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 A类型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月编辑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传 真: 010-58608409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区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0年第**10**期

杜导正：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周惠谈话”辨伪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广西农王韦拔群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颠覆“联共（布）党史”的一部著作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